



孙敬诚，1979 年出生，湖北安陆人，因擅长湖北大鼓而得艺名“孙小鼓”。他从小喜欢曲艺，崇拜湖北大鼓大师张明智先生。1999 年，他从武汉中南艺术学校毕业后，师从湖北大鼓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承葵，得到了湖北大鼓的真传。

2000 年，孙敬诚决定到吉庆街去闯生活。刚去时，他曾经放不下科班出身的架子，生意惨淡。白天睡觉、养嗓子，晚上拉活、唱大鼓，度过了三年艰难的时光。为了“不给师傅和大鼓丢脸”，硬是挺下来的孙小鼓，在吉庆街渐渐有了名气，听大鼓的人越来越多。

但孙小鼓不满足于现状，他有更大的梦想：要把湖北大鼓从“职业”做成“事业”，将湖北大鼓发扬光大，以回报家乡父老对湖北大鼓的热爱。他自创了近百个湖北大鼓作品，演艺事业日隆，成为吉庆街的一个招牌。2004 年，他加入湖北省曲艺家协会，2006 年获评“笑声传中国”武汉区十强，2019 年获评“吉庆之星”。图为 2012 年 7 月，孙敬诚在为客人表演湖北大鼓。

“希望有一天湖北大鼓能成为湖北民间曲艺的品牌，走向全国。”孙小鼓一直有着自己的湖北大鼓梦。

（图 / 文 周国献）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游 迎

编 辑：华 蕾 张川蕾

封 面 设 计：王 鹏

城市之根

<<< <

4 变迁：三访盘龙城遗址 / 刘云松

扶贫路上

<<< <

10 扶贫路上的夫妻档 / 谈雯丽(口述) 王静文(整理)

14 不等不靠真脱贫 自立自强奔小康

/ 柯 进(口述) 严 瑕(整理)

精工匠心

<<< <

18 我手持火炬向前奔跑 / 吴勇刚(口述) 白爱萍(整理)

山有黄门

<<< <

22 刘守华先生的民间文学学术人生 / 黄永林

29 民族学博物馆开馆前的 100 个日日夜夜

/ 吴永明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 年第 6 期 (总第 332 期)

委员天地

<<< <

34 我的抗疫感悟 / 王 荔

37 以初心为本 向使命而行 / 曾学斌

往事漫忆

<<< <

43 我和导师陶德麟先生的师生情 / 倪素香

49 《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案背后的故事
/ 肖国金(口述) 徐静芝(整理)

人物春秋

<<< <

53 问津河畔的教育世家 / 谢文先

都市史话

<<< <

57 新洲清代举水书院杂记 / 王腊波

楚风汉韵

<<< <

60 苏恒泰油纸伞的前世今生 / 苏 峰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变迁：三访盘龙城遗址

◇ 刘云松

如果你从未亲临此地，你永远也无法想象，在繁华的江城——武汉市竟还潜藏着这么一片隐蔽的“城市绿洲”。她南邻府河，北靠盘龙湖畔，依天然水体与人工院墙为界，将一片绿水青山与周遭的四衢八街分开。墙外，车水马龙；墙内，草长莺飞。彼岸，高楼栉比；此岸，漱石枕流……缠满绿藤的院墙与汨汨湖水隔绝的不仅仅是都市与绿地，它们同时分割着过去与现在，隔绝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包裹着历史的厚重以及限界之外希望拨云见日、早日一窥其真容的好奇者的目光。此地，名为盘龙城遗址，而我，就是一名幸运的“好奇者”。自2014年首访盘龙城遗址至今，已过去6个年头，在此期间，我有幸从当年的一个对历史、考古，特别是对盘龙城遗址背后的文物考古工

作尤为感兴趣的旁观者，逐渐成长为盘龙城遗址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见证者，甚至为现在的亲历者，我所体味到的“变迁”无处不在。那么，就让我们溯时光与记忆长河而上，用时间去重温，用记忆去镌刻，这6年时间里我三访盘龙城遗址的变迁记。

初访盘龙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与盘龙城遗址的初次结缘还需从一次饶有兴致的夏令营之旅说起。2014年7月底至8月初，正值南方酷暑盛夏，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举办的“第七届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却在此时如期举行。源于对家乡历史以及考古发现的热爱，当时还是高三的我报名参加了此次也是唯

——一次以荆楚考古发现为巡行线路的夏令营。2014年7月31日，夏令营第三天，我们参观的首站便是盘龙城。由于夏令营第一天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就已看到过不少出自盘龙城遗址的商代古器，依凭带队老师的讲解，对盘龙城遗址已有一知半解的我对接下来的参观愈发感觉神秘与期待。但未曾料初次见面，盘龙城遗址在我心中的印象就大打折扣。

当夏令营的巴士刚驶过连接武汉市东西湖区与黄陂区的府河大桥，车里就有带队的老师提醒大家即将抵达此行的目的地——盘龙城遗址。好奇的我也不免受到车内情绪的感染，将眼睛贴紧车窗，极目向大桥西侧、府河的上游望去，因为他们说那里有一座城。可除了略显浑浊的府河河水以及满岸的郁郁葱葱，我实在再难以发现别的些许关于一座城池的蛛丝马迹。驶过府河大桥后，大巴很快到达目的地，与对岸的东西湖区不同，此时此地更多地透露着一种城市边缘的清冷气息，不时有运送渣土的卡车驶过，弥漫在空气中的尾气与飞沙让人似乎有一种正在驶离城市的错觉。好在遗址所在并不是顺着马路上渣土车的方向一路向北，大巴刚在马路对面停稳，大队人马便在老师的带领下贴着道路西侧一排行道树的空隙插进了一条土路，卡车虽然

没了，但人们迈向前的步子在开合，在脚步和湖风所带起的一阵飞沙里，我听到一个声音，“盘龙城遗址到了！”

尽管最初的眼缘不好，但接下来老师们的解惑答疑却令我大开眼界。在这条土路的尽头，我们依次参观了盘龙城遗址文物陈列室，以及正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宫城区和杨家湾南坡等地区。在老师的细致讲解下，我才明白原来平平无奇的土丘竟是数千年前恢宏的商代城址所在，原本一览无余的空地竟是统治者朝堂、寝宫的基址所在。不过比起苍白的讲解，更令我感兴趣的是考古工作为人们提供的全新视角：通过对遗址宫城区城墙的解剖，考古工作者们可得知城垣内外边界、各城门的具体位置结构甚至于城垣墙体的构筑方法；通过对杨家湾南坡所布探方地层的研判，考古工作者竟可得知数千年前商代先民对此处土地的利用与改造甚至于假想复原出当时的阶梯地貌。“透物见人”“见微知著”，这是我对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以及考古这门学科的第一观感。



2014年，北京大学考古夏令营营员参观盘龙城城垣本体保护工程

除此之外，此行令我感兴趣的还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以及围绕此建设展开的各项文物保护工作。我看到在盘龙城遗址宫城区，文物保护、修复与展示工作配合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然展开，施工工人们用版筑、“土包土”等方式开始修缮保护宫城区的城门、城墙。与此相关，听说盘龙城考古队在杨家湾南坡的发掘，除了是为厘清大型宫殿建筑结构外，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建。因为大遗址保护，要求考古工作对遗址内涵有深入的了解。分析杨家湾南坡大型宫殿建筑结构及其南面堆积的基本状况和性质，有利于加强对盘龙城遗址聚落布局、生产以及生活的理解，从而有助于阐述盘龙城聚落的社会场景，最终为盘龙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的研究和展陈环节增光添彩。但即便如此，初访盘龙城的我还是难以想见，未来将与遗址考古工作相配套、起到相辅相成作用的考古遗址公园以及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将会达到何种高度，呈现给世人以何种面貌。我这时已听说盘龙城遗址早在2013年就定立了详实的《考古工作计划》，而且在我初访前不久亦开始着力于构建永久性的三维坐标系统——这在当时的田野考古和大遗址保护领域可以说是一大创举。但无论如何，要走的路还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我初访盘龙城遗址的印象。

二访盘龙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2017年过完农历新年不久，我又一次来到了盘龙城遗址。自2015年11月盘龙城考古队开启对小嘴岗地的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已获得了一批与青铜器铸造活动直接相关的重要遗存，而此时我作为武汉大学历

史学院考古专业的一名本科生，也是考古队的一员，配合同窗师长完成小嘴遗址考古发掘的收尾工作。身体力行的考古实践使得我终于可以更直观、更便捷地观察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保护工作所取得的点滴进展，专业知识的积累也能够容许我对以上所提及的工作进展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批判。说到底，此时的我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见证者。

二访盘龙城给予我最大的触动莫过于曾经绘于蓝图中的遗址公园几近建成。过府河大桥往北，曾经为自然绿地所环绕的盘龙城遗址已经在外围修建了独立的院墙，沥青混凝土路面自岔路口一直通向园区内部。从遗址公园大门进入，只见草坪修剪整齐，景观林木也显然得到人工的精心照顾，公共洗手间、凉亭座椅、公共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园区内极目远望，视野空旷而绿廊辽远，完全是一派寂静辽阔的田园旷野风光。如此景象，很难再让我将其与记忆中的黄泥土路、野草丛生联系在一起。同时亦容易令人忘却，此地距离汉口商圈也不过10来分钟车程而已。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盘龙城宫殿基址模拟展示工程。即使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如若没有恰如其分的展览方式，也不过创造出一个城市绿地，而远远不足以称其为考古遗址公园。盘龙城宫殿基址模拟展示工程经历了头一次雨水冲塌的“滑铁卢”之后，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积极吸取经验教训，上下求索，引进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采用竹编工艺，运用玻璃钢材料以及采取3D打印宫殿基址建筑构件的新方法，成功做到了宫殿基址模拟建筑的可视、耐用、美观与历史、考古的实际相结合，在使重要遗迹得到妥善保护的同时，令其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盘龙城宫殿基址模拟展示工程的附近，还依照原样保留了几个当年发掘时的探方，在现代技术的加固下，探方得以永存，为观者复原了一个当时考古发掘时的情景，令考古遗址公园不负“考古”之名。

小嘴发掘地点因发现与铸铜活动有关的遗存而备受关注。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嘴遗址南端采集到石范等铸造遗物，但2015~2017年度，在我们对小嘴遗址这一带展开发掘时，却把发掘地点选择在了距采集点以北大概100余米开外的地方——该地点的确定得益于盘龙城遗址所做的大规模勘探工作。为配合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盘龙城遗址所做的勘探工作不仅规模大而且系统性强，甚至专门开发“盘龙城遗址田野考古钻探系统”用以记录和管理勘探资料。与此同时，盘龙城遗址还建立了永久性的三维坐标系统。利用这一系统，我可以使整个遗址不同年份、不同地点的空间数据在统一的坐标系统中精确记录下来。“钻探系统”与“坐标系统”的建立，实际上是对考古工作中空间位置以及考古数据记录和利用的一次革新。所以二访盘龙城的我，再无需依赖初访时所见的罗盘、皮尺。在师兄师姐的带领下，探方的布绘、重要出土遗物的定位均可利用手持的RTK移动站解决；而对遗存分布情况的回溯，亦可通过PAD直接观看“钻探系统”生成的遗址不同时期地貌模型以做判断。除此之外，二访盘龙城的我还接触到了许多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念，学会了使用便携式X荧光仪检测遗址中一些区域的铜等金属含



2015~2017年度，空中拍摄的盘龙城遗址小嘴铸铜地点发掘区

量；学会了从技术环节对作坊出土遗物进行归类，最终得到关于这一区域遗迹性质的推定；还有初涉聚落考古、环境考古、景观考古等理念……实际上不仅仅对于我而言，对于每一个见证或亲历过盘龙城遗址变迁的人，甚至对于盘龙城遗址自身而言，这些新的东西都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方法和新理念。这一时期我曾多次站在盘龙城城址之上，西望小嘴铸铜活动区域，东望李家嘴贵族墓地，旁人看以上三者不过是三块被湖水分割开的陆地而已，但我却知晓，3500年前三地之间必然是陆地相勾连——这一点我们已经为水下的考古勘探所证实过了。重建的早期地理景观，对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展陈亦有着相当大的启示，这

决定了其今后如何向观者述说这一段历史往事。我二访盘龙城，不难看出，无论是田野考古工作还是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都是在既定计划与已有经验下与时俱进地吸收新的东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这是我二访盘龙城所感。

三访盘龙城：兼收并蓄，面向未来

时间一晃来到了2019年，距我初访盘龙城已过去了5年。5年间，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斩获颇丰：2015年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2016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7年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

2019年七八月，又是南方一个酷暑难耐的盛夏。此时的我，正像我的师兄师姐在盘龙城迎接当年参加考古夏令营的我那样，准备迎接远方即将到来的客人，但与当年不

同的是，这一批客人来自大洋彼岸。虽然肤色不同，甚至交流不畅，但我们的目标相通，即都准备投身于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的发掘。

社会不断发展，盘龙城遗址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首先，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新馆终于建成。其建筑风格恢宏大气，展品陈列令人目不暇接，且依托其资源，各级学术交流活动、会议明显增多，盘龙城遗址日渐成为早期商文化学术交流的明星之地。其次，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行开放，让普通民众得以走进博物馆、走近古遗迹，用眼观察、用心体味中华文化的渊源博大。再者，是学术交流活动深度的加深、广度的扩大。2018年年底，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项目启动。2019年七八月，第一支盘龙城中美联合考古队成立，从此我们不再闭门造车，我们在考古工作的最初环节——田野工作中就已开始寻求最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国



201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学生参观盘龙城遗址

际学者共享我们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未来3年中，联合考古队将重点探索遗址聚落形态和布局、手工业生产、自然环境变迁、区域聚落形态分布与互动等课题，对盘龙城遗址的功能与性质作更深入的探讨。

依稀记得初访盘龙城时，我作为旁观者，在听闻师长介绍杨家湾南坡的发掘收获时，就已隐隐琢磨盘龙城先民对当时土地的改造和利用。没想到5年后，这个问题会再一次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在杨家湾北坡发现了与南坡相似的状况和先民对土地整饬的痕迹。但与当年不一样的是，我们拥有了一支国际联合的考古队伍，拥有了包括电法勘探和物探雷达在内的考古勘探、发掘新技术，拥有了精准记录的田野考古钻探系统，拥有了包括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三维建模在内的考古资料记录手段，拥有了集合记录所有田野、室内工作的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从技术到方法，从观念到思想，而今的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正如同焕然一新的盘龙城遗址一样，正在阔步迈向新的台阶。

“兼收并蓄，面向未来”——这是三访盘龙城我对它的期望与盛赞。

明代李贽《和韵》有云：“沧海桑田几变迁。”读其诗，感觉是“沧海桑田”一般的事才说得上“变迁”。对应起盘龙城遗址，“变迁”似乎至少也要用以形容盘龙城商城这3500年来的东海扬尘、星移物转。但其实于我而言，这5年间三访盘龙城遗址的观感，足以用“变迁”形容。这5年间，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相配套的遗址博物馆从无到有，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而展开的考古工作更是捷报频传，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好关系。一方面，一线的考古工作为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珍贵的遗物、遗迹资料，在公众视野中扩大了

影响力；另一方面，遗址公园的建设恰恰也为考古工作后续提供了最好的文保场地以及最宽阔的学术交流平台。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进行，从筚路蓝缕到而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实转念一想，我的求学之路似乎亦有相通之处？从一开始对考古懵懵懂懂，到现在初窥门径，甚至希望“一入此路，坚守此生”，我得感谢盘龙城遗址，这不仅是它的变迁记，也是我的变迁记。

（刘云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扶贫路上的夫妻档

◇ 谈雯丽（口述） 王静文（整理）

我是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的工会副主席谈雯丽，我的丈夫祝勤是硚口区社区教育学院行政校长，我和丈夫已经结婚 30 多年。2016 年 12 月，我们夫妻俩接受硚口区选派，分别来到黄陂区罗汉寺街钟岗村和李家集街六家砦村驻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当时我母亲刚刚做过手术，需要有人照顾，我们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认为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要有情怀的，所以我们将父母托付给妹妹、妹夫，毅然决然地奔赴黄陂区驻村扶贫。为了更好地开展扶贫工作，组织上照顾我们夫妻俩，让我们在六家砦村老村委会的一间 10 平方米小房中安家，这一住就是 3 年，先后帮两个村的 61 户贫困户摘掉了贫困帽。

从复式楼搬进集体宿舍

我到六家砦村扶贫时，精准扶贫工作正值攻坚阶段。六家砦村位于黄陂区李家集街西部，建档立卡贫困户 21 户，我丈夫祝勤所在的钟岗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0 户。钟岗村与六家砦村的直线距离是 16 公里，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把家安在六家砦村，祝勤每天开着私家车“上下班”。

我们的“家”是一个由老村委会改建的集体宿舍，狭小空间里挤着 3 件家具：一个办公用的电脑桌、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折叠衣橱。窗户正对着村里的一个厕所。晚上睡觉时，老鼠就在天花板上咚咚地跑来跑去。

虽然我们夫妻从自家复式楼搬进了 10 平方米的小房，但却帮助两个村子 20 户贫困户完成了危房改造。

黄菊芳是六家砦村的一名贫困户。2012 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和一堆债务。黄菊芳患有多种慢性病，孩子还在念书。她家的房子是 1997 年盖的，当初为了省钱，把老屋拆了后还能用的小瓦片移过来，铺在屋顶上。过了 20 年，屋顶上的瓦破的破、碎的碎，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接水的盆子一摆就是十几个，但黄菊芳一直没钱修房。

我到六家砦村后入户走访，看到黄菊芳家里四处漏雨，楼梯也没有栏杆，厨房没有粉刷，红砖露在外面，破洞漏风，老鼠乱窜。于是就帮她申请了危房改造，经村委会商讨、村民代表大会评定，2017 年 3 月，黄菊芳家开始整修，由我全程监理。

两个月后，黄菊芳的家整修一新：屋顶换上了结实的红瓦片，屋里粉刷一新，厨房全新装修，还做好了整体橱柜。为此，她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多亏了你，我们母子才能住得这样好。”

黄菊芳家改造竣工两个月后，武汉下了一场暴雨。我们在汉口的家位于顶楼，由于阳台排水沟被堵，雨水倾泻倒灌进家中，把家里全淹了。我跟祝勤双双驻村，已有半年多不在家，

直到楼下住户发现后，才通知我们。我们夫妻俩找了个双休日回了一趟家，心疼地找人把全屋地板撬了重装。

八旬老父支持夫妻档

长年驻村，顾不了家，单位一般不会安排夫妻俩都去扶贫。我来扶贫，还是祝勤劝说的。

祝勤比我早驻村半个月，他到罗汉寺街钟岗村的第一周，就跟我说扶贫工作责任重大。当时他所在的钟岗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的因病致贫，有的因学致贫。村委会的房子是土砖砌成的，坐在里面开个会，身上就能落一层薄薄的土。

祝勤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看着这情景，他特别想帮他们一把。后来，他在电话里把农村的情况说给我听。恰巧，我所在的单位当时也要派一名干部到黄陂区扶贫。他听说后就游说我：“干脆你也来，我们一起



2020 年 5 月，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砦村的宿舍内，祝勤、谈雯丽夫妻各自忙碌着

扶贫。”为此，他还专门带着我到村里转了一圈，“你看，我们在这里能做很多实事，可以有所作为。”

我是上海人，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知之甚少。听了祝勤的话以后，我动心了，也想到农村新天地里闯一闯。可我俩都下乡

了，家里老人怎么办？我还是有些犹豫，虽然我们的女儿已经成家，不用我们照顾，但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父老母，我实在放心不下。

我的父亲谈志钦是一名老党员，知道我们两个的想法后，当即表示支持：“扶贫是一件大好事，你们都愿意干，那就去吧，不用担心我们。”有了父亲的支持，我马上跟妹妹、妹夫商量好，请他们帮忙照顾父母。随后，我就向单位提交了驻村扶贫申请。

打那以后，我们夫妻俩和其他扶贫干部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祝勤还成了扶贫工作队食堂的兼职厨师，每次吃饭，我就给他打下手。驻村3年多，我已经能说一口纯正的黄陂话。

每天吃完晚饭，我们夫妻俩都要围着村子一边散步，一边想点子，讨论怎么帮村民脱贫。我俩搭档开办的月嫂培训班，就是在散步中商量出来的。

驻村以后，我们发现村里的留守妇女很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何不让她们



2020年5月29日，谈雯丽（左）到村民家中走访

学习一技之长，方便以后再就业。我了解到，月嫂行业用工需求大，工资较高，能不能对留守妇女进行月嫂培训？我们夫妻俩说干就干，祝勤四处拉赞助、找老师，准备在两个村里开办免费月嫂培训班。

“免费？哄人的吧。”“月嫂证不好拿。”刚开始，村民们议论纷纷，心存疑虑。培训班开课了，李家集街和罗汉寺街的几个村有49人参加了首期免费培训班，最后有43人拿到高级育婴师资格证，村子里沸腾了，“原来是真的！”接下来的第二期培训班，又有72位留守妇女考到了证书。如今，有的“金牌”月嫂已月入7000元。

真心帮扶，送学上门

在村里扶贫，有许多老人特别关照我们。我们村里有位87岁的五保户余兰桥，经常会从自家菜园里采摘一袋蔬菜，挂在我们房间的门把手上。我们不收，他还会急眼。

余兰桥是我驻村后第一个走访的贫困

户。因为他和我的父亲同龄，所以我隔三岔五就去帮他收拾家务，送去水果和牛奶。“你爸爸好吗？你都没法照顾他，却总是来看我。”好几次，他都拉着我的手抹着眼泪说。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有一天，我父亲买了一双新鞋，也给余兰桥买了一双，让我捎给他。我记得，当时我给余兰桥穿上时，他特别开心。

村里还有一名贫困生叫余妮，在我们的帮助下，她成功考上了大学。

余妮的父亲患有残疾，靠打零工赚钱，母亲在家侍弄田地，弟弟余聪也因残疾辍学在家。我跟丈夫了解他们家的情况后，经常一起到余家走访，一边鼓励余妮继续读书，一边为她家争取相应的教育补助。我打听到黄陂区有一家特殊教育学校，可免除所有学费，便立即帮忙联系，让余聪入校。余妮的学费也按政策得到减免。2017年，余家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虽然余家已成功脱贫，但我们仍然经常去走访。一年以后，余妮参加高考，首先把分数告诉了我，还请我帮忙参考填报大学志愿。

余妮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一年6000多元的大学学费和住宿费又成了难题，他们差点要打退堂鼓。我跟丈夫又开始给他们做工作，把学校的助学金、教育局的教育补助等政策普及到位。当年夏天，余妮成功入学。

因为余妮是个姑娘伢，我担心她进入大学后自卑，就经常在微信上鼓励她。像教我的女儿一样，教她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跟同学相处，如何参加社会实践……余妮自己也很要强，通过竞选，她当上了学生会干部，还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

2017年12月，六家砦村21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2018年12月，钟岗村40户贫困户也全部脱贫。

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我们俩退掉早已订好的机票，取消了与女儿全家团聚的计划。我现在非常庆幸，如果走了以后被困在外地，可就耽误工作了。

疫情期间，祝勤下沉到社区参与防控，我就在自家小区当志愿者。3月23日接到上级返村通知后，我立即开车出发，大路封了走小路，辗转3个多小时回到村里，开始了扶贫攻坚关键一年的工作。

3月25日，我在村中度过了55岁生日，这是我在村里过的第4个生日。按理来说，我已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扶贫工作还没结束，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5月28日，我特意请了半天假，从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砦村返回市区，向单位递交了延迟退休申请书。

现在，我丈夫祝勤已经结束扶贫工作回到原工作岗位，但他还是钟岗村的扶贫顾问，只要有空就会去村里帮忙。我要留在这里，继续巩固扶贫成果。

（谈雯丽：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工会副主席，硚口区派驻黄陂区李家集街六家砦村扶贫干部；王静文：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文中有关资料和图片由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胡蝶、彭仲、郭良朔提供）

不等不靠真脱贫 自立自强奔小康

◇ 柯 进（口述） 严 瑕（整理）

1996年夏，我出生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个偏远贫苦的农村，母亲体弱多病，哥哥又重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困难；2015年，一场无情的车祸，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唯一有着酿酒手艺的爷爷，上了年纪，力不从心，生活异常艰难。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于2014年成功考入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因为“穷惯了”，我一方面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凭借着灵活的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学校做一些兼职，还和同学合伙做一些小生意，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也正是这些经历，为今后“真脱贫”打下了基础。

2015年，为响应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的精准扶贫活动，脱贫摘帽攻坚战在安山正式打响。通过精准识别，我家成为第一批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对象，享受助学扶智和雨露计划，在学业费用方面减轻了很大的压力。面对铺天盖地的扶贫政策宣传，我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勤劳致富光荣、贫困落后可耻的思想在脑海中猛然迸发，要脱贫、要致富、要给母亲减轻负担的想法在心底潜滋暗长。

大学期间，正值“互联网+”时代，李克强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更是激发了我的创业思潮，于是，我开始打“爷爷的原浆酒”的主意。我的爷爷柯希财80岁高龄，从小就跟着我的曾祖父用祖上传统的古法酿酒，以精选优质的稻谷和高粱为原料，家酿纯谷酒口感清冽，醇厚绵

长。等顾客上门买酒是爷爷习惯的传统营销模式，我建议采取“互联网+”的营销模式来改变传统的家酿纯谷酒销售渠道，但是爷爷的老一辈传统思想接受不了新生事物，认为“互联网+”的营销模式不但增加了成本，风险也更大了，是不可取的。为了说服爷爷，我寻找了好多成功的网络营销案例劝说他。终于，爷爷答应让我试一试，从那时候开始，我走上了互联网营销的道路。

曾经，酒都是在安山销售，走不过区，出不了市，跨不出省。现在，在我的改革下，2015~2017年间慢慢打开了家酿纯谷酒的销售渠道，通过在微信朋友圈里推广销售自家的纯粮原浆酒，并充分利用快递物流将酒远销省内外各大城市。如今，原浆酒已经搭上互联网、乘着快递的顺风车走区、出市、跨省，市外到了天门、仙桃、潜江、荆州、鄂州、黄冈、咸宁等地，省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青海、山西、内蒙等地。爷爷看到销路这么广，笑着说：“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过自己酿的酒可以卖这么远，还深受省内外顾客的喜爱，这以后我就在家把关，你们出去销。”

2016年，我凭借实习工作加上网上销售业绩，很快就为家里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由于“脱贫不脱政策”，在助学扶智和雨露计划的继续帮扶下，2017年，我顺利完成了学业。从小就生活在农村，深深受着农村环境的滋养，我舍不得农村，舍不得原浆酒，正如舍不得家人一样。2017年6月，我大学毕业恰逢当时江夏区委组织部



2019年7月9日，柯进（左）在江夏区安山街道文化站领取区级非遗奖牌及传承人证书

招聘村（社区）“两委”后备干部，我放弃了城里的就业机会报了名。通过层层选拔，我最终被录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自己的村部，做了一名后备干部。工作上，我严于律己，生活上，我踏实肯干，不仅得到街道、村委领导的赞赏，也得到了“手艺人”爷爷的认可，爷爷决定把酿造纯谷酒的工艺悉数传授于我。我接过了爷爷的手艺，也接过了爷爷的信任和期望。每天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像爷爷这个老工匠一样，仔细甄选上等的稻谷和优质的高粱做原料，经过浸泡、清蒸、下烹、拌曲、上缸、发酵、蒸馏等一系列传统工艺，酿造出自己的纯粮原浆老烧酒。由于杜绝添加和勾兑，得到了老客户的赞赏，也赢得了网络新客户的好口碑。

2017年11月，为了打开酒的销路，进一步扩大市场，我通过申请精准扶贫小额贴息贷款，开始了创业路上的新征程。我打造出了一系列的订制陶瓷酒坛，代替了原来塑料酒壶那种低端的包装，同时，根据市场的

变化和不同顾客的需求，从低端到高端，提供私人订制服务。如婚喜寿宴上可定制专用酒。特色包装，古色古香，让人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放感觉。让纯谷酒的销售既有了自己的特色，又有了质量的保证。我家酿的酒，销量很快从原来一年几千斤上涨到近2万斤。销量上去了，为了把控质量，我不仅严格把关酿酒工艺，还牢牢把控酿酒原料，一方面，利用村民闲置的荒田自己种稻谷，另一方面，每年到了秋天，硕果累累，我又忙着收购粮食，因为村民秋收的季节也是我酿酒的好时节。由于农村大多数老年人在家种植水稻，收割与销售比较困难，而我家种植的一片稻田采用的是收割机收割稻谷，我将其推荐给村民，采用现割现收的方式，且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帮助村民解决了稻谷收割与销售的困难。与此同时，我还



2020年年初，柯进（左）给村民采购配送生活物资

为他们提供技术、标准，并全部收购，保障村民收入，带动村民致富。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自身的努力下，如今我家已经实现真正脱贫致富，我也成为贫困户争相学习的致富带头人。2018年，我将家中老房子拆了重建，全家住上了三层楼，并完善了酒坊设施。2019年4月，我荣获江夏区“优秀青年”提名奖，原浆酒酿造工艺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授牌发证，我本人也成为江夏原浆酒酿造工艺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又入选第十四届武汉市青年联合会社会组织和新兴青年界别委员。2019年10月，我注册了“安山柯家酒”品牌。

2020年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我家的酒坊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身为年轻的后备干部，我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疫情防控工作中。“土豆3斤、洋葱3斤、鸡蛋10个，胃药、心脏病的药……”微信里、电话里不间断地接到村民开出的“菜单”，我骑着三轮车穿梭在村湾之间，风风火火地采购和配送，虽然每天重复着琐碎的小事，但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障村民的日常安全。每天早出晚归，除了代购生活用品，还要摸排村民身体状况，巡回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但我一直在坚持，我告诉自己：“特殊战疫时期，虽然我还只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我一定会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

4月初酒坊复工后，生产出的首批200多斤手工纯谷酒，已经全被老客户们买光了。这段时间挺忙碌的，其中鄂州的一位老客户，一次性又订购了新酒200斤。疫情过后的红灯村，逐渐苏醒过来。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我开始了疫情后的复工复产，着手设计了“安山柯家酒”品牌

Logo，并通过朋友圈推荐和网络销售，积累了一批固定的老客户，滋生了一批潜在的新客户。

谈起现在的生活，我充满信心，斗志昂扬。是党和政府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与致富的信心，一步步敲开了致富之门，走上了致富之路，接下来我会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拓

宽致富道路，在致富的路上走得更远。2020年我也给自己订了个小目标：在工作上，争当先进；在经济上，除去完善酒坊设施和支付家庭开支，每个月争取能存5000元钱。

“把扶贫贷款还清，另外把前年家里新建的三层楼板房也装修下，全面小康要有新气象。”最近，我又在尝试自己当主播带货卖酒。“如果粉丝多了，不仅能卖自己的酒，还能帮助村民们销售绿色农产品，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的大目标是想做好以酒文化为主题的乡情民宿，把周边的民宿连成一片特色民宿。另外，游客来到酒坊时，还可以自己亲自动手发酵、酿酒，贴上标签，等发酵好了再亲自蒸酒并带走，带动相关经济产业发展，并带动村民就业，把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古法酿酒手艺传承下去，并让整个村子越来越好，有效带动当地村民致富。我继承祖辈的传统酿酒工艺，只是现代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一个缩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

回顾在脱贫致富道路上奔跑的这4年，



柯进（右）和爷爷在酒坊里酿酒

24岁的我有着同龄人没有的经历。这些年，多亏有党的好政策和政府的真帮实扶，让我能够改变家庭贫困原状，实现脱贫摘帽，逐渐走上致富之路。

（柯进：武汉市江夏区安山街红灯村后备干部；严瑕：武汉安山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科员）

我手持火炬向前奔跑

◇ 吴勇刚（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叫吴勇刚，是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钢构公司焊接培训中心电焊工、高级技师，湖北省、武汉市首席技师，武汉市劳动模范，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能专家。

2018年年底，我荣幸地当选全国技术能手。2019年9月，我被评选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荣誉接踵而来，看看周围艳羡的目光，我很淡然。说实话，对于这些名誉，我并不是很看重，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手持火炬的人。

（一）

1994年，我刚满19岁，走出技校大门，来到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钢构公司从事焊工工作。

在接过焊枪的一瞬间，我很兴奋，焊花四溅、电弧闪耀、烟尘四起，我觉得眼前

的这一切既新鲜又炫目。可马上我就意识到了这个行业的“痛苦”，苦的是焊接作业的工作环境，痛的是焊花溅到身体上烧出的累累伤痕。我没有退缩，暗暗对自己说，既然选择了这一行，那就要把这一行干好，而且那炽热的铁水、飞溅的焊花、两块拼接在一起的钢板，都给了我极大的成就感。不久，我就喜欢上了焊接这个活儿。

我和焊枪、焊把“扛”上了。我虚心向师傅学艺，认真琢磨，一有时间就蹲在自己的工位上苦练技艺。上白班，我就晚上下班后练；上夜班，我就白天练，拿着焊把的双手被磨出了血泡，我简单处理一下接着练。1995年夏天，我结束了学徒生涯，正式成为一冶施工大军中的一员。我记得很清楚，自己第一次参与的工程是上钢五厂大电炉，我和工友们一起承担24米长的承轨梁焊接工作。当时上海的气候条件很恶劣，酷

热难当，而且刮起了大风，给焊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与工友们聚在一起想办法，最终决定用帆布将整个大梁包裹起来，只留一个口子通风，以此来保证焊接质量。大热的天，我和工友们钻进帆布袋里施焊，焊一会儿，就出来透口气；再焊一会儿，再出来透口气……为了减少接头，保证焊缝质量，我主动延长焊接时间。中午吃饭时，别人都下班了，我仍饿着肚子坚持将焊缝在预热的状态下连续焊完。最后，我焊接的焊缝经无损检测，全部达到规范要求。

我很高兴，在焊接这个行当，我能独当一面了。日子如流水一般逝去，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不能一一道出。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夏天的一项工程。当时已是副班长的我带着10多名焊工在福建接手电子城工程水泵房焊接工作。该工程开始是由其他单位施工的，因没有干好，业主将此工程转给一冶接着干，要求24小时内通水。这一变故意味着先期做好的管子要重新拆改，且泵房的地沟里还有很深的积水。我们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排干积水后，我二话不说，率先将雨衣垫在泥地上，躺在地沟里焊管道。刚刚抽干积水的地沟内，蚊虫肆虐，专门叮咬身体暴露在外面的部分，钻心地痒。焊条熔化时的熔敷药皮味、浓烟在高温下散发出的气味、臭水沟的异味，混合在一起只往鼻孔里钻，令人作呕。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我带领班员们终于按时完成了水管焊接，经业主验收，无任何渗漏。

就这样，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焊接这条道路上成长了起来。我意识到光能吃苦是不够的，还要善于解决棘手问题。因此，我把别人玩的时间都

用在了学习焊接理论、苦练焊接技术中，只要稍有空闲，我就刻苦学习《焊接工艺》《金属学》《金属材料》《焊接设备》《锅炉压力容器》……短短的几年下来，我的焊接技能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在武钢二热轧承轨梁的制作中，我采用二氧化碳和氩气的混合气体焊接工艺，并使用双手握枪的焊接手法，和同事们用15天就完成了28根承轨梁的焊接任务；在现场拼装武钢二热轧厂房屋面梁时，我革新焊接工艺，节省焊接时间，提高焊缝合格率，业主和监理公司给予高度评价；在武钢三炼钢3#转炉工程中，我和师傅带着焊工突击队，采用二氧化碳药芯焊接工艺，仅用2周时间完成了外方专家要求10周完成的任务……

在施工一线，我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里，我在全国冶金建设行业第六届焊工技术比赛中夺得第九名，在武汉市第十四届职



2020年3月，吴勇刚在进行6G仰焊位的管板焊接操作

业技能大赛中摘得桂冠，先后获得武汉市劳动模范、湖北省首席技师等多项荣誉称号；我采用轨道“铝热焊接技术”进行轨道焊接新技术的试验，60kg/m 的钢轨对接焊在 30 秒内完成，焊接质量满足铁道部钢轨质量要求，填补了一冶的一项技术空白；我发明的专利《小口径管道坡口加工方法及装置》，为公司节省了购买管道

坡口加工设备的资金；我利用自己独特的焊接修复技巧对铸铝零件、磁力转铸铝外壳及各种设备进行补焊修复，为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

有人说我是焊接方面的天才，而我认为没有人生而知之，天才大都出于勤奋，而我自己也只不过是一步一个脚印，用 99% 的努力和汗水浇灌出成功的果实。

（二）

2005 年，我进入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钢构公司焊接技术培训中心，成为了一名技能教师，承担起了培养焊接高技能人才的责任。人才培养是百年大计，我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培训中心，我迅速进入角色。

“焊枪的角度要保持在八九十度左右，然后往前走，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向上挑的动作，有一个划圈的动作……”

“戴着防护罩，焊接的时候会有所变形，你在防护罩里看着是直的，实际上焊缝是斜的……”



2020 年 6 月，吴勇刚（左二）对参加湖北省职业技能大赛选拔的选手进行焊接操作技术指导

在培训中心的焊位上，我握着学员的胳膊，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指导学员进行焊接操作。

成为老师后，每天早上 8 点，我都会召集学员开“集体会议”，逐个分析讲解昨天学员所焊试板中存在的问题，让学员们带着问题开始新的一天的培训练习。随后，我会走进每个焊位，蹲下身子对学员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在焊接中，焊枪的角度十分重要，教学员的时候，我不厌其烦地抓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的手有感觉，带着他们进行手的摆动和移位，这样焊出来的焊缝才能更加均匀。

实操训练结束后，我会把学员们带到劳模创新工作室，用幽默的语言给他们讲述自己和其他劳模在施工一线的故事：“当时呀，那股混合在一起的味儿可别提多销魂了，但是没有办法呀，任务就是进军的号角，我们把雨衣垫在泥污里，躺在那里焊接，一焊就是一天一夜……那股味道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用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告诉学员们什么是焊接，什么是工匠精神。我

觉得除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把劳模的钻研精神和拼搏精神传承下去，“业精于勤荒于嬉”，“勤”才是焊接这个行业人才辈出的不二法宝。

多年的言传身教和倾囊相授，我教出了一个又一个技术能手，他们在各项焊接大赛中脱颖而出。2010年，我重点帮带的张汉青、赵宗合、彭宏育、王静在全国冶金建设系统第九届焊工技能竞赛中取得焊接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二名、第三名、第七名和第十四名的好成绩；2011年，武汉市第十七届职业技能大赛电焊工决赛中，经我培训的选手获得团体第一，赵宗合、昌林叶、魏三英分获个人第一、第二、第四；2014年，湖北省第六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我带队摘得大满贯；2016年，我带出来的选手参加湖北省职业技能电视争霸赛夺得了团体第一；2017年，我的学员孙建军一举夺得武汉市第二十届职业技能大赛技术状元。

（三）

在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钢构公司焊培中心，我的“护犊子”是出了名的。依托强大的硬件、软件实力，一冶钢构焊培中心名声在外，是湖北省各大制造企业及职业院校的培训首选，培训名额一席难求，甚至有外地学员直接扛着行李上门求学。不管是哪个渠道来的学员，进了焊培中心，我都一视同仁，手把手地细心教导。时间一长，学员们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总想着找我来解决，而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尽全力发现好苗子，培养焊接人才。

2015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先后被授予“武汉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湖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湖北

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更于2018年7月被正式认定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工作室虽然用的是我个人的名字，但成果都是大家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承担起攻关、创艺、研发、交流的功能，加快高技能人才聚集，让绝活能够传下去，让人才快速发展。

如今，我的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已成为一冶集团钢构公司焊培中心的品牌，工作室成员都是取得重大成就的老师，绝对可以用“明星阵容”来形容。10多年来，焊培中心先后诞生了全国劳模1人、武汉市劳模3人、湖北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武汉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全国技术能手2人、省部级技术能手和技能大师9人、市级技术能手和技能大师6人。比如，全国劳动模范、技术能手赵宗合就是我带出来的。

这几年，有人在我耳边嘀咕，说我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对此，我不以为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徒弟比师傅强，这样焊接技术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名誉对于我来说只是身外之物。弧光闪闪，焊花飞溅。专注做工匠，创收为企业。我更想当一个手持火炬、播撒火种的人，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我愿燃烧自己磨砺技能、传道授业解惑的激情，点燃学员学技术、钻技术、争当劳模、争做工匠的火种。

（吴勇刚：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钢构公司焊接培训中心电焊工、高级技师；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刘守华先生的民间文学学术人生

◇ 黄永林

刘守华, 1935年8月生, 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人。195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1月被华中师范大学聘为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学 术

刘守华先生一生钟爱民间故事、追寻民间故事, 他用自己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刘先生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 这个江汉平原乡村民间文艺异常丰富, 因此他从小就与老百姓创造的民间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先生尤其喜爱民间故

事, 上大学后, 他选择民间故事作为研究方向。1956年, 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 受到学界关注。1957年, 他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研工作, 正式开启了民间故事的研究之路, 并为此砥砺前行。

1979年, 刘先生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民间文学》刊发后, 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85年, 他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后, 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被认为是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各民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著”的产生。1995年, 该著作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1985年, 他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刊授大学之约撰写了《故事学

纲要》一书，其后经过修改充实，198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刘先生在对国内外故事学研究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进行的建构。

1986年，刘先生第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著作《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出版。书中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果，对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或特色之异同性作了多侧面论析。这部著作的原创意义在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突破，以及对此后建立比较故事学体系的奠基性贡献。为探求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叙事的关联，他曾7次上武当山搜求以“张三丰传说”为主体的武当故事传说，经数年耕耘，终于撰写完成《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这部著作出版后获得了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为探寻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深远影响，刘先生用几年时间通读《大藏经》，搜寻相关故事，并同中国活态民间故事进行细致比较，完成了专著《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出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1995年，刘先生的《比较故事学》一书出版，这部书以一种达观、开放的学术精神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领域，通过富有说服力的多民族之间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支持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比较文学内涵的理论。为此，以乐黛云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们认为：“新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



1993年3月，刘守华教授（二排右二）率中日学者赴鄂西五峰县山村走访民间故事家刘德培（二排左二）

面投入最多、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推刘守华教授。”

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构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关键。为完善中国民间故事学体系，刘先生主动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经过8年苦心探索，他的67万字学术巨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于1999年正式出版。这部书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文本为线索作断代的纵向演绎，以佛、道文化对故事的渗透影响为专题作横向剖析，译解和评述力求切合它们作为口头叙事作品在一定民俗文化环境中的真实含义，基本实现了对民间口头叙事传承本来风貌的复原。在研究方法上，将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常见的母题、类型研究法和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融会贯通，紧密联系故事构成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承者的文化心态，探求其实际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象征意义，注重发掘被形式所遮蔽着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国民间故事史》一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称赞：

“这一繁难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部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成。日前，此书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将译成英文、日文在国外发行。

学风

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别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刘先生以执着勤奋、严谨务实、求真开拓、追求卓越的精神和丰硕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关于自己的学术成长经历，刘先生不止一次谦虚地谈道：“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来，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

刘先生喜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文学，经常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研。他曾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副主席长达15年之久，足迹遍布湖北全省各地，与乡村民间艺人广结情缘。他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他密切关注民间故事及传承人的形成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他多次到神农架和鄂西偏远山村进行田野调查，访问民间艺人，撰文向国内外介绍这些民间文艺传承人，将这些中国民间文

学推向世界。他与有关部门和学者一道将湖北五峰山区民间故事讲述人刘德培老汉推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列为“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他还请刘德培老汉上大学讲坛。当刘德培老汉生活困难时，他联络北京的学者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捐助的呼吁。当刘德培老汉病逝时，他带人冒着雪雨赶到鄂西山村，彻夜给这位中国的口头语言大师“跳丧”送行。其后，不论是对长阳的孙家香、夷陵的刘德方两位故事家的研究与推介，还是对宜昌的青林寺谜语村、十堰的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的考察与开发，刘守华先生虽年逾古稀，但都是亲临山野，认真调研，悉心指导，合力推动。如为研究民间故事家刘德方，刘守华先生亲自前往栗子坪山区刘德方家乡进行实地调研，在研讨会上，他通过将刘德方和已有的几位故事家作认真比较，反复推敲之后，认定刘德方为“三峡地区现今最具活力的故事讲述家”而推向全国。

刘先生曾用长达30年时间对“求好运”民间故事的经典个案进行跟踪研究，在搜集210余篇异文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这部书共收录以他的“求好运”故事研究论文为主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14篇，选辑中国18个民族及亚欧7国的80余篇异文，是世界首部AT461型故事（即以国际通用故事情节类型分析法编定为461型的“求好运”故事）的研究成果与故事文本合集。这本书获得了湖北省文联授予的文艺评论著作奖。刘先生说：“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着，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

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为了民间文学，即使遭遇不测，在生命危机之时，刘先生也不忘他的民间故事。2002年岁末，他在湘西山区参加完民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对当地的民间文学进行田野调研。不幸的是，返程途中遭遇车祸，造成3根肋骨断裂、1块金属片插入额头的重伤，一度较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然而，当刘先生恢复意识后，问的第一件事却是调研的记录稿是否还在。听到这句话，在场的人都流泪了。刘先生当时已67岁，在常人看来，大难不死就应该放弃一切，安度晚年，可他偏不，康复后仍一如既往地奔走于乡间田野，采集民间故事，忙碌于教学和科研。

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至今，刘守华先生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0多年。虽然大半辈子做同一件工作，但他从没有感到过厌倦和乏味，也从不敢懈怠。刘先生曾这样说：“‘术业有专攻’，我喜爱民间故事，在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的百花园中，作为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常常乐而忘倦。所以，我的学术活动，一直以故事学为中心，不断扩展它的广度与深度，以期取得超越自我、超越前贤的原创性成果。”他就是这样，为我国民间文艺事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奋斗着。

学缘

刘先生认为，自己在学术上能取得一些成绩，除了执着与勤奋之外，还得益于学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因此，他常怀着感恩之心在文章中提及他们。他在《五湖四海结学缘》一文中详细记叙了他与钟敬文、季羨林、丁乃通、李福清等国内外名家的学术情缘，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在我国，民间文学是“五四”以后新兴的人文学科。20世纪50年代，钟敬文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培育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刘守华先生虽然没有机会进入钟先生的门下受业，但他和钟先生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只要有机会赴京，他都会去拜访钟先生，就民间文学研究问题向钟先生求教，钟先生的不吝赐教，使



1993年5月，刘守华（右）在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拜访钟敬文先生



1985年9月，刘守华先生（后排左三）以及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后排左五）与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小组主要成员合影

刘守华先生深受启迪，获益良多。刘守华先生在《百岁老人千秋业》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钟敬文先生对建设中国故事学的卓越贡献：“钟老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民俗学之父，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百年历史中，对作为人民文化重要一环的民间文学坚守学苑矢志不移，并以与时俱进的敏锐学术眼光和举旗领军的磅礴气势来奋力推进，成为一项光耀百年的学术传奇，不论学术与人品，都是激励自己奋进的楷模。”刘先生还将钟敬文先生为他题的字“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断鞭策自己。

在《风范长存忆季老》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回忆了季羨林先生的鼓励和教诲：“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

刘先生广结学缘、虚心求教，不仅十

分重视与国内学者的交流，而且非常重视向国外学者学习，积极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具有学贯中西、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视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美籍华裔学者、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作者丁乃通教授，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院士，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邓迪斯教授，以及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的饭仓照平教授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和学术联系，通过通信和撰文共同探讨民间文学领域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并邀请他们来校交流和讲学。

在坚持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刘守华先生充分吸取现代国际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成果及方法，以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同时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故事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正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刊文指出的那样：“刘守华先生的研究，从视野、对象到成果，都早已冲破了国界，进入世界学术大网络之中。”

学 生

在刘守华先生长达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仅身体力行地耕耘于故事学领域，

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教学与行政资源，培养了一批故事学人才。在民间故事研究的“刘家军”中，既有一些直接在他门下受业的弟子们，也有一大批“门外”的在刘先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基层民间文艺工作者和学术骨干。

1960年，刘守华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走上民间文学讲坛。1985年，他开始招收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其后又招收博士研究生，可谓弟子盈门，桃李满天下。刘先生培养学生十分看重他们的学术兴趣和特长，鼓励学生发展个性，勇于创新。为了解学生的学术特长与个性，每届新生开学时，刘先生都会组织学生召开交流会。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充分了解新生各自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发现每个人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并依此来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向。

1985年，我有幸成为刘先生带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刘先生根据我的学术兴趣和发展潜质，为我量身定制了一份学习和研究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关系的研究生计划，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就是沿着这一规划延续和发展的。其后我出版并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几部著作，也都是按照刘先生为我制定的这一研究计划进行的。可以说，当初刘先生为我定制的这份学术计划是成就我今天学术梦想的重要基础。刘先生反复强调：“做学问应该高瞻远瞩，把视野放宽些，多学习吸收新的东西，在多个学科之间寻求创新的灵感。”在刘先生的师门下，走出了近百名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和副教授，以及一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如神话研究领域的陈建宪教授，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林继富教授、刘晓春教授、蒋明智教授、孙正国教授，少数民族叙事研究领域的肖远

平教授、郭崇林教授、覃德清教授，等等。他们中还有多名担任高校校长和副校长、各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全国专业学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等。

刘先生授业的范围，不限于他的弟子，也不限于高校的学生，而延伸到了有民间文艺爱好者的广大地区。在湖北省，有刘守华先生“四大门外弟子”之说，这四位分别是武当山的李征康、宜昌市的王作栋、神农架的胡崇峻和蕲春县的郑伯成。

1981年7月，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举办民间文艺骨干培训班，学员中就有来自湖北省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的李征康，从此他与刘守华先生结下学缘。在刘守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李征康搜集整理了《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并于1990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伍家沟故事村开始知名于全国，2006年进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后，刘守华先生和李征康合作，还主办了全国性的吕家河民歌学术研讨会，向全国各大媒体推介吕家河民歌，使吕家河民歌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享誉全国。李征康因在民间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推选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武当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作栋，20世纪60年代末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五峰县文化馆从事文艺工作。王作栋和刘守华先生的相识，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省在兴山县举办民间文学骨干培训班开始的。在刘守华先生的指导下，王作栋完成了对五峰山区民间故事家刘德培全部口述民间文学作品的采录，并选取400多篇故事编成《新笑府》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刘守华先生一方面将王作栋作为新时期采录研究民间故事成

绩最为突出的民间文艺家，写进他的《故事学纲要》，同时又鼓励和指导王作栋深入研究刘德培，直到将刘德培推荐为“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隆重表彰。因发掘和研究刘德培民间故事贡献突出，王作栋先后被提拔为宜都县文化局局长，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及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因汉民族神话史诗《黑暗传》的搜集与研究，神龙架林区的胡崇峻与刘守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在《黑暗传》的搜集整理过程中，刘守华先生通过书信支持和指导胡崇峻，这给了胡崇峻莫大的动力。刘先生还将胡崇峻搜集整理的《黑暗传》推荐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和台北的出版社出版；并牵线搭桥，让胡崇峻和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珂建立联系，接受这位著名神话专家的教诲。胡崇峻在给刘先生的书信中这样写道：“你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当永世不忘。使我深深感受到著名学者的正直无私，堪称师表。”后来，《黑暗传》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叠叠泛黄的书信，见证了两位学者的君子之交，而这份深深的情谊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1980年，湖北省第二期民间文学骨干培训班在黄州举办，在这个班上，刘守华先生与来自医圣李时珍故里湖北蕲春的郑伯成结下师生情。在刘守华先生的鼓励下，郑伯成搜集李时珍传说编成《神医李时珍》一书，刘先生认真审读和修订了书稿，于1989年由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2011年，李时珍传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郑伯成退休后仍钟情于民间文学，他将自己的全部成果汇编成180万字的《蕲春民间文学》一书并自费出版。回顾与刘守华先生多年的交往，郑伯成在《我与湖北蕲

春民间文学》一文中写道：“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积极地鼓励我；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主动地进行调解和主持公道……可以说，我在民间文学事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刘守华教授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寥寥数语，两位学人的深情已溢于言表。

在刘守华先生那里，教师工作是没有边际的，只要有需要——咨询答疑、查找资料、修改文章、写作序言……他都热心相助，尽力而为。无论是山野乡村的文化人，还是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无论是门下的弟子，还是远在异国他乡的海外学人，他都是有求必应，诲人不倦。刘守华先生说：“我喜爱这一学术事业，也喜爱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和青年学生。不仅在校内，还有校外乃至海外那些素不相识的学子冒昧求教，我都是热心尽力给予指导和帮助，并为他们所取得成就感到无比欣慰。学生是老师事业与学术生命的延续，我永远怀念从童年起不断给我以知识和力量，点燃我心田圣火的那些可敬可爱的师长，我也愿意排列在他们后面做这样的老师度过自己的一生！”正是众多像刘守华先生这样的老师，以自己独特的学术品质，丰富着人类的知识与智慧，推动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并凝聚成为一种熠熠生辉、代代相传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催生着学科的发展，培育着学养的形成，促进着大学的发展。

（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民族学博物馆开馆前的 100 个日日夜夜

◇ 吴永明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座以“民族学”命名的博物馆，它于 1986 年 11 月 29 日正式开馆展出，至今已有将近 30 年了。当年，为民族学博物馆准时开馆四方奔走、日夜操劳的老领导、老前辈、老同事们，好多人已经过世了。我作为参与者之一，追述民族学博物馆开馆前 100 多天日夜奔忙的日子，为的是铭记这段历史，并缅怀那些逝去的前辈和同事们。

接受新任务

1986 年 3 月，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新馆竣工了。一所粉墙绿瓦、完全民族风格的园林式建筑矗立在南湖之滨，成为中南民族学院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

6 月下旬，唐奇甜副院长找到我说：“6 月 17 日，在院党委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博物馆工作。为确保民族学博物馆在院庆 35 周年之际准时开馆，党委决定，进一步充实民族学博物馆的领导班子，抽调你（我时任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为民族学博物馆的临时负责人。在吴泽霖教授的具体指导下，编制 16 人（现有 15 人），再拨专款 10 万元作为布展和开馆之需。也就是说，你们要在 11 月 29 日之前，顺利完成开馆的一切筹备工作。你，有没有信心？”我略加思索，肯定地回答：“既是学校党委的决定，从工作需要出发，我服从安排。”

接受新任务后，我静想了几天。在北京上学和工作的二十几年里，我虽然参观过不少博物馆和各类展览，但由我主持民族学博物馆的布展和开馆工作，心里还是没有

底。底气不足，怎么办？对，向吴泽霖先生请教去。

吴泽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中国民族文博界的权威专家，主持过国庆十周年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全国民族工作展览。在“小八栋”，吴老静静地听完了我的诉说，他告诉我：“现在，文物有了，人才有了，经费有了，关键就看你如何把每个人的智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齐心协力，还怕不能按时完成布展和开馆？”吴老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顿时信心倍增。

7月上旬，我就到博物馆报到。通过几天的座谈和个别交流，博物馆每个同志的专长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地清晰了。更让我感动的是，1984年8月27日，国家民委（民教字〔84〕第388号）文件批准，中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名称改为“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编制为16人。大家憋着一股劲，都盼望大干一场。同事们的自信和劲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苦干加巧干，一定能够完成布展和开馆任务。

时逢暑假，在短暂的休整、料理家事之后，8月初，博物馆全体人员准时开工了。

奔赴哈尔滨

展架、展柜、展板、灯具，还有文物保管部的保管柜，是博物馆的必备用具。可是，当年中南民族学院撤销时，一切办公用品统统折价处理或散失了，新馆舍就是一个亮丽的空壳，连一块展板或一个镜框也找不到。怎么办？一切都得白手起家。经协商，保管柜就由院木工房加工制作，拨给专款3万元，10月1日前交付使用。展柜呢？负责布展的陈靓、邵树清等同志冒着酷暑，赶

往汉口的武汉展览馆、武昌的湖北省博物馆等几个单位了解情况。经过前后十余天的调研，他们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用木质的展架、展柜。先进料，再请木工赶制，一切皆在武汉就地解决。缺点是一次成型，不能变更。二是用组合式铝合金的展柜。优点是高矮、宽窄、形状可以根据布展的需要，随意拼接或拆卸，可以多次反复使用，当年还是属于最新的展具。缺点是价钱稍贵，更主要的是，当时这种铝材只有哈尔滨有。选用哪套方案，在虚心听取赵培中、邵树清、陈靓、和平、张惠朗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的意见后，大家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利弊，决定采用组合式铝合金展柜的方案，不但实用，还能抢回一点时间。此方案也征得吴老同意和院领导的批准。9月2日，徐开启和赵志广两位同志身负重托，冒着暑气，从武汉出发了。

当年武汉通往东北既无动车、高铁，也没有直达快车，必须到北京转乘京哈线。为了节省费用，他们连卧铺票都舍不得买，一路硬座直奔哈尔滨。不久，消息传来，已跟哈尔滨101厂谈妥，以每吨28500元的价格，订购了1.3吨铝合金材料，只待汇款到账，就按我方要求的规格下料。

9月下旬，徐开启、赵志广两位同志押着1.3吨铝材，随车返汉。当年哪有什么物流公司，一切都得他们亲力亲为。一路艰辛，唯有他们自己知道。此时，大家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布展工作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清理旧文物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馆藏南方少数民族文物近万件。这些馆藏文物都是

1953年原中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保留下来的展品，后全部移交给中南民族学院作教学、科研工作之用。为此，学院还专门建立了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1972年，中南民族学院撤销，陈列馆的9907件南方少数民族文物全部由国家民委转托中央民族学院保管。

中南民族学院恢复重建之后，在学院临时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吴泽霖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的恢复重建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1984年8月27日国家民委（民教字〔84〕第388号）文件精神，同年12月25日，随着负责赴京清理文物的彭武文、张惠朗、孙秋云等同志返校，中南民族学院的中南少数民族文物运回了武汉。这批文物，共22箱9262件。说到这里，应该感谢中央民族学院替我校保管了这批珍贵文物，才避免了十年动乱中的流失。但老大哥也“截留”了全套的苗族银饰和高山族文物，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文物是博物馆的财富，也是展出的本钱。近万件民族文物由北京运回后，一年多来，一直堆放在临时库房里。家底不清，如何布展？清理文物，势在必行。

1986年9月下旬，几十箱文物全部搬进了博物馆一楼大小库房。20世纪80年代学院复办之初，哪有什么空调、电脑之类，博物馆顶多有几台吊扇和排风扇。火炉武汉的9月下旬依然没有入秋的迹象，加之博物馆坐落在湖畔，致使库房又潮又闷。文物保管部有4位同志：张惠朗、李玉萍、皮永和和吕小苏。张惠朗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同志，曾担任过湘西自治州博物馆的文物保管部主任，很有经验。在她的带领下，一件件文物开箱消毒，清理归类，登记造册，一切

都是手工操作。这些30年前征集和捐赠的民族文物，件件都是老古董，且一直压在箱底，如今重见天日，散发出阵阵难以名状的气味，工作环境可想而知。但他们没有嫌脏、嫌累，一直默默地工作着。

10月下旬，文物保管部顺利完成文物清理工作，从而为下一步的布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协力搞布展

新馆舍建筑面积2931平方米，有三大两小共5个展厅。大厅200平方米，小厅85平方米，展出面积共770平方米。其他为办公室、接待室、大小库房等。

遵照院庆办公室的安排，第一展厅（大）留作“院35周年校史展”之用，主要展示中南民族学院恢复重建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由院科研处负责。第三展厅（小）搞集邮展览，由老干部焦奋同志负责筹办。其余3个展厅，由博物馆根据现有馆藏文物情况，自行安排展出。

从现有馆藏文物情况来看，海南岛黎族藏品比较丰富，从生产、生活用具到婚姻、丧葬、节庆、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文物相当齐全。吴泽霖教授的学生赵培中同志多年来一直在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地区从事民族调查，不但熟悉情况，他本人还摄制了大量的影像资料，足以充实现有的藏品。因此，吴老推荐了赵培中同志，第四展厅（大）就以《海南黎族》命名，作为民族学博物馆的第一个民族学展示的试点，由赵培中、刘卫国等同志负责实施。

为了配合民族政策再教育，普及民族知识，帮助大学生们了解我国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大家庭，根据现有的馆藏文物，

准备搞一个《南方少数民族服饰》展放在第二展厅(大),由我和陈靓等同志负责实施。剩余的一个小展厅,根据现有藏品,只能搞一个《南方少数民族工艺品》展览,由我和邵树清等同志负责。另外,为迎接校庆日的开馆活动,还准备装修一间接待室。该项目由和平同志负责,并拨专款1万元,作为室内装饰及购置沙发、茶几等用度。

从10月初开始,除文物保管部同志全力投入清理馆藏文物和接待室开工装修之外,全馆其他同志在徐开启、赵志广两位同志的指导下,全力以赴地投入组装5个展厅的展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施工制作实属不易。各展厅展出内容不同,对展具的要求也不同;即使同一展厅,因展出的文物不同,对展具的要求也不一样,高矮、宽窄各有所需。好在事先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设计了多种规格,并按需下的料。因此,组装工作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组合式铝合金展具,又扛又抬,又拆又拼,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的,一个白天也拼装不了几个展柜。5个展厅的展具要在短期内组装

完毕,谈何容易。当然,可以请武汉展览馆的师傅来拼装,他们比较熟练。但是,请人是要花大价钱的。总共才10万元开办费,购置铝合金材料花了近4万元,木工房制作保管柜3万元,装修接待室又是1万元。布展工作刚开始,购置玻璃、五夹板、灯具、镜框、服装模特以及洗印照片、制作文字说明等各种花销还在后面。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干。白天未完成任务,晚上加班加点。那段日子里,只要家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一到晚上,大家都自觉地赶到博物馆加班。晚上,各展厅灯火通明,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一干就到11点多,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骑车离开博物馆时,既没有夜宵,也没有加班费。

10月下旬,各展厅展具的组装基本结束,文物清理也即将大功告成。此时距离校庆日只有一个月了,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博物馆负责的第二、四、五等3个展厅,全面转入提取文物和安装版面的工作。大家分工协作,一起投入布展,有的到文物保管部提取展出文物,有的给展柜安装玻璃、背板

和灯具,有的到汉口的大影楼洗印展出的照片,有的跑到汉口、武昌的大商场选购服装模特,以及沙发、茶几等用品,有的则忙于装修接待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校庆日准时开馆,人人都在忙碌着、奔跑着,有时忙得连吃饭都忘了。

《海南黎族》展厅由于原有的藏



位于中南民族大学校内的民族学博物馆

品比较丰富，加之又有赵培中同志提供的一批彩色影像资料作支撑，整个展览十分丰满、充实。《海南黎族》展览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工作展览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展示民族工作成就为主，而是以民族学理论为指导，突出该民族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使海南黎族的社会性质和各支系的特色一目了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南方少数民族服饰》和《南方少数民族工艺品》两个展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原有藏品数量众多，但重复的多，真正能看得上眼的极少。也不可能再到北京租借或制作新的，只能就米下锅，从数千件旧藏品中反复比较，挑选最能体现各民族特点的服饰、手工艺品进行展出了。1953年，中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时，各省区积极选送、无偿捐赠，除少数银饰外，基本上都是日常穿戴过的服饰。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过了30年，服饰之新鲜度可想而知。我负责的《南方少数民族服饰》展厅就是这样，从文物保管部挑选借取了一大堆各族服饰，让模特穿上后，摆放到展柜里，再请大家来评议。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

11月中旬，博物馆负责的3个展厅已初具雏形，只差图片和文字说明了。各种规格的黑白、彩色照片先后从汉口影楼取回，并制作上版。可是，文字说明还得手工书写。当时既无电脑，也没有复印机，但好在博物馆早就储备了人才，文物保管部的皮永和同志就是一位不满30岁的年轻书法家，他和邵树清同志义不容辞地挑起这副担子，夜以继日地为各展厅书写各种文字说明。斑斓多彩的各种南方少数民族服饰、织锦，配上隽秀的文字说明，着实为展出增色不少。

11月27日，各展厅的布展工作基本结束，接待室也已装修一新。民族学博物馆全

体人员奋战了1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收获了胜利的果实，顺利通过了预展，并获得院领导们的肯定。

1986年11月29日上午10时，中南民族学院建校35周年庆祝大会暨民族学博物馆开馆仪式，在民族学博物馆正门前广场隆重举行。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川，以及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兄弟院校的嘉宾，中南民族学院各系部的各族师生代表，共数百人参加了庆典活动。副院长唐奇甜致辞，石川和老院长白瑞西为民族学博物馆开馆剪彩，吴泽霖等在汉各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庆典。开馆仪式后，省、市领导同志在学院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民院校史》《南方少数民族服饰》和《海南黎族》等展厅。

光阴如箭，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为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的恢复重建而奔走呼吁的老领导，为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博物馆的开馆而日夜奋战的老同志们，如贾清波院长、唐奇甜副院长、吴泽霖教授、赵培中、徐开启、赵志广、邵树清等都已先后作古。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就是为了缅怀这些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们为民族学博物馆作出的积极贡献，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

（吴永明：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本文写于2015年）

我的抗疫感悟

◇ 王 荔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这次武汉疫情让我变得很感性，提起笔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了。很多人说非典时期疫情也是来势汹汹，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而且疫情中心并不在武汉，所以没有过多的恐惧和害怕，也没有亲人或朋友离世的伤感。

这次疫情发生时临近春节，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觉得疫情很快就会结束。腊月二十九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青山老家吃了团年饭，奶奶要求在老宅呆到正月初三以后再回来和我们一起住，所以爸爸留在老宅陪奶奶，我和妈妈就回到沌口家里等他们。结果没有想到1月23日封城后，市内也实行了交通管制，每天看着各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我开始有点恐慌了。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我

并不敢表现出来，还要劝慰妈妈放宽心态。每天接到朋友们互相祝福和关心的电话，让我觉得很温暖。但从初五开始，我接到了有朋友被感染的消息，有的还是年前亲密接触过的，那时并未戴口罩，我开始恐慌、彷徨。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白天都装得很正常地做饭，收拾家里，和妈妈一起看电视、看新闻，到了晚上却整夜整夜地失眠。有时候半夜自己躲在被窝里面哭，都不敢出声！

重新振作

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会颓废，精神会崩溃。正好市民进的朋友李欧天打电话给我，他们成立了一个志愿者团队，采购了很多物资，有食物、医用酒精等，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医院，可以向其捐赠。我忙说：“有的，

需要我去送吗？”他说不用，觉得我是女生，在外面不安全，让我就在家打电话协调，他们来配送。那段时间，我每天坐在沙发上打电话联系各家医院的医护朋友们，询问他们医院需不需要医用酒精，后来又找到生物学领域的许萍委员，她很热心，帮忙联系了好多医院的院长。那段时间，我每天忙到凌晨1点多，捐赠了100多桶（25升）的医用酒精、少量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武汉市普仁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武汉市第八医院等各大医院和汉阳物资调配处。

新冠肺炎疫情也牵动着我们全体戏曲工作者的心，我所在的武汉汉剧院响应号召、配合防疫的同时，用实际行动和蕴含戏曲艺术元素的表现方式，向奔赴抗疫一线守卫人民的勇士们致敬，精心策划和创作了《爱与我们肩并肩》《武汉城》等一批汉剧戏歌。与此同时，我积极参与抗疫文艺作品的创排和义演，为武汉加油，为早日战胜这场疫情助力！那段时间我特别开心，每天很忙碌，觉得帮助到了别人，自己又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我也不再迷茫。

披挂上阵

2月11日接到党员下沉社区的通知，我踊跃报名，但因家住火神山附近，交通管制很严，没有办法到指定的下沉社区，向院领导汇报后，我就近到蔡甸区西湾湖社区下沉报到。我们8个业主党员志愿者小分队每天为社区的独居老人送物资，为小区居民分发网购生活用品、买药、发快递等。特别是给独居老人们送物资上门的时



2020年6月，通过云直播的形式，王荔委员将经典汉剧《状元媒》搬上屏幕，与戏迷们云端见面

候，我们除了送生活物资，还要送心理安慰，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爱！

下沉的时候我想到了汉剧院的其他党员们，他们下沉的都是老社区，人口较多，被感染几率较大，比我危险，我很担心他们，于是联系到了东西湖中医院万秀文院长，想找他购买预防的中药。万院长一听是给下沉干部，当即免费送了120包的预防中药，这样我们汉剧院的党员同志们相对安全，我也就放心了。后来得知他们所在的社区缺少红外测温枪，我又找到市侨联的陆涛，给汉水桥街海工社区、学院社区、解放社区等前后捐赠了31个红外测温枪。

西湾湖社区要求对小区住户排查并进行健康码登记时，我们又开始每家每户上门

排查。有的业主不理解，不给开门，怕被传染，我们耐心劝解，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业主，作为党员正在社区当志愿者，服务小区其他业主，希望大家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样才能尽早地恢复正常。小区老人居多，很多都是儿女没有来得及赶回来，他们也不会下载登记健康码，我就把操作不了的住户逐一登记，等大部队排查完毕后再去各个家里，为他们下载登记。遇到使用老人机的，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时，我就打电话给老人家属，让其帮忙登记。我记得有位年近六旬的奶奶，儿女都没有回来，她一个人住，每次收到物资她总是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你们！”她还跟我说，她没有办理银行社保登记，两个月没有拿工资了，要我帮忙在手机上办理。其实我也不会，不过为了不让老人失望，我满口答应了。后来我找到小区物业，让他们帮忙操作办理成功了。那位奶奶听说我也是业主，说我太负责了，解封以后要极力推荐我进小区业主委员会当主任呢。老人们对我工作的认可和信任，让我充满了力量和感动。

当在新闻里看见各个社区都在分发爱心菜，很多业主问我们社区为什么没有时，我们业主志愿者自发为居民们联系了爱心菜。因为没有车辆运输，我就找到蔡甸区黄江波副区长，他帮我借到了一辆卡车，一大早我们就去“抢”爱心菜，下午开始给居民们分发。

疫情期间，物价上涨，我们又住在郊区，购物不方便。为此，我又联系了一些养鱼的渔民，让他们将养的鱼成本价卖给居民，这样既解决了鱼塘鱼类待销问题，又解决了居民生活问题。

发放爱心菜的时候，有居民调侃我，为什么我天天有防护服穿，怎么不给其他

志愿者穿，我笑着说：“这套防护服我都穿了20多天了，仅此一套，只能每天消毒，反复使用。刚开始的时候医用物资紧缺，社区居委会也没有防护服，这还是我以前囤的一件，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我也是一名“战士”

我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含泪哽咽地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对于这句话，我表示深深的认同：武汉人是伟大的，是听话的，他们坚守在家！他们不出门就是作贡献！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位市政协常委，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自小学习汉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深知“国家危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战士”，身赴战场，虽然我不能像医护英雄们那样奔赴前线，但是我在后方也努力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关爱，感受到了逆行英雄们的英雄气概，感受到了武汉人民的团结。疫情让武汉人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有爱！

尘埃之微，补益山河。萤烛末光，增辉日月。虽然在这场战疫里，我的力量很微薄，现在的武汉也慢慢恢复正常，但是这场战斗还在继续，我愿意用自己的行动，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和政协委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我们守护的居民带去胜利的希望！

（王荔：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汉剧院演出二团团长）

以初心为本 向使命而行

◇ 曾学斌

参加工作 40 年，说实在的，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有的只是在平凡的工作中，以满腔热情，用青春和汗水，用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工作凝结而成的感悟。几十年来，我从一名普通的员工成长为一名劳动模范、一名政协委员，伴随着企业和城市的发展壮大履行一份责任、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自豪而欣慰。

军旅锤炼铸底色

1963 年，我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市卢市镇严家河村，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童年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快乐的。这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

纯朴的农村人。我母亲从小裹足，立足不稳，父亲脚长鸡眼，行动障碍，用残疾来形容一点不过分，不能从事重体力活，一辈子就拿六分的工分。家里虽然很穷，但父母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坚定地支持我们读书、读好书。我家兄弟四人，在同一所高中连续读书 10 年，这种投入在农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方圆百公里内找不到第二家。为了供我们读书，脚有残疾的父亲常年挑着一担柴禾行走八里的乡间小路到镇上换取必需的学费和生活费，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十年的坚持与艰苦，无以言表。

高中阶段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高一下半年，我以全校调考成绩第二名的身份进入特快班，却在 1980 年高考中以 3 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面对着老师让我复读的劝说，

我坚定地做出了选择：我要当兵！我要上战场！我要保家卫国当英雄！

我姐夫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复转军人，他说服镇武装部部长让我破格参加了体检。可能是老天爷有意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我的各项条件特别优秀，达到了特种部队录取标准，被招兵的领导相中，委以新兵班临时班长职务。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司令部首长值班室工作。当兵的第二年，我成为司令部公务班班长，作为首长身边的特别代表，参加了湖北省、河南省的征兵工作。

1981年8月11日至8月27日，河南省许昌、平顶山地区出现了长达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造成大沙河上游特大洪水，威胁到郟县及周边区域及平顶山水库的安全。一天，正在连队蹲点的首长突然接到地方政府的紧急求助，立即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大堤进行视察。当我随后乘坐大卡车赶到事发地点时，洪水已将河堤冲垮，水位快速上涨，首长的车被洪水包围。此时，一栋栋房屋轰然倒塌，发出巨大声响，灰尘腾空而起，马、牛、羊、野生动物等被洪水挟裹、席卷而下……



2016年12月，曾学斌委员在洪山区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我以水中的玉米杆为辅助工具，拼命向上游方向移动，在与首长会合后，迅速返回前沿指挥部传达指示，调动车辆，并赶回司令部为值班领导提供信息参考。在抗洪救灾中，我两天滴水未进，当年参战的部队共有7人牺牲，但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减员。抗洪救灾结束后，我荣立三等功。

商海沉浮干事业

从部队退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1985年到鄂城钢铁厂工作了3年后，我调回武汉，在武汉市粮食局机械厂工作。1993年下岗后，我发起成立了中美合资武汉科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一职。后公司转型失败，十年的积累毁于一旦。

2003年，我就职于武汉骏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8年间，公司从一个只有7个人的小店，迅速成长为IT行业湖北省的前三名，店面达到47家，从业

人员达到1000人，成为武汉科技一条街（洪山）的利税大户，获得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武汉市和谐企业、武汉市模范职工之家等诸多荣誉。

2008年5月29日，武汉科技一条街（洪山）IT商会成立。同期，在洪山区总工会的指导下，我发起组建了商会工会委员会，并担任工会主席，让近万家商户20余万名员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成立

后，我们致力于化解劳务纠纷、处理客户投诉、帮扶贫困大学生、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等，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和贡献，得到了省、市、区三级工会的高度评价和全体商户的尊重。

2008年12月，我就任武汉凌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后来，我又先后在湖北省精诚投资襄阳分公司任总经理，在武汉泰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助理。2018年4月至今，我在武汉锦绣方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兼品质管理部经理。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我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对待工作精益求精，多次获得公司先进个人、洪山区职工信赖的“娘家人”、珞南街工会先进个人、洪山区先进劳动者、洪山区优秀劳动者等荣誉称号，并在2019年获得武汉五一劳动奖章，在2020年获得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参政议政勇作为

2009年元月，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民革党员，任民革洪山区工委副主委兼第一支部主委，从此开启了我的参政议政之路。

2011年，经组织推荐、协商，我正式成为政协洪山区第八届委员会委员。2016年续任政协洪山区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副秘书长一职。在洪山区政协委员年度考核中，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并入选委员风采录宣传片。

作为洪山区政协特聘信息员，我曾获湖北省民革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武汉市民革参政议政先进个人一等奖等。担任民革武汉市洪山区工委副主委

以来，我建立了健全的信息工作机制，通过抓好骨干信息网络建设等多项举措，广集民智，收获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提案：《关于争办2015年中国国际消费信息产品博览会的建议》引起省委主要领导高度关注，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武汉成为继青岛之后第二个“中国国际消费信息产品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应迅速整治我区南湖片区四轮电瓶车非法营运问题》，被洪山区政协形成《情况与建议》，副区长万磊批示办理后，泛南湖地区（武昌+洪山）营运电动车全部被取缔；《关于尽快规范我市社区公章使用的建议》，受到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出台九项规定，采取“三取消两精简三规范一禁止”措施，为社区减负松绑；《关于整治“僵尸车”的几点建议》的社情民意，被全国政协、省政协采用，武汉市也于2015年全面启动城区主干道“僵尸车”整治工作；《关于在洪山区全面实施政协委员进社区的建议》，得到市政协原主席吴超的高度重视，亲自到洪山区进行视察、调研，并在珞南街率先得到挂牌落实，该建议还被带到省“两会”，省人大专家组在珞南街进行了专题调研；《应改变年检标志、环保标志、交强险标志于车前挡风玻璃的粘贴方式的建议》《关于尽快在湖北高校创办特殊教育学院的建议》《关于统一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建议》《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刻不容缓》等，被市委《武汉重要信息》《每日汇报》刊用，相关建议得到了重视和采纳。

我还是洪山区人民法院的一名陪审员，从委任那天起，就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工作之余，我主动听取案件审理过程、摘录相关资料、翻阅法制文献、收看法制报道等，还经常与法院同志进行交流、沟通、相互切



2019年4月，曾学斌委员获得武汉五一劳动奖章

磋、积累经验，先后参与了刑事、民事、经济类等案件的陪审近百起。在陪审工作中，我学以致用，遵守司法礼仪，维护了审判独立，提高了办案质量，保障了司法公正。

逆行人生展风采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作为一名57岁的退役老兵，我不改军人本色，毅然选择逆行突击。

疫情期间，最危险的地方当属医院，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和患者有密切接触的工作。我已年近六旬，还有常年的基础病，属于高危易感人群，但当火神山医院急需物业保洁开荒人员时，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同事劝我：“老曾，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可我觉得我能行，最缺人的

时候，我能上，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跟上。后来，锦绣物业领导班子全体动员，包括公司老板在内的10名高管全部报名参加，我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疫情初期，受封城影响，道路运输力量十分紧张，但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刻不容缓，只有清理干净每一个卫生死角，我生活了半辈子的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城市才能快点回来。我每天奔走在因为空荡荡而变得陌生的城中，不见往日熟悉的车水马龙，仿佛从有声电影回到了默片时代，只有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提醒我，这个城市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不是医生，上不了医疗救援的最前线，但是我可以尽力让物资保障的通道更畅通一些……

在当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除了把家里的红外体温计和水银体温计都赠送给在管小区外，我还把邻居的测温枪借给了小区；为有需要的社区购买口罩、消毒药水、防护服等防控物资，我几乎跑遍了武汉三镇的所有药店。

在洪山区，有很多部门只要找不到购货渠道，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从申请捐赠到物资到手，我不断来往于省红十字会和各街道之间。货物申请到手了，还得帮忙运回来，送到指定的地点。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紧张，我又通过朋友圈发布求助信息，积极联系有运输资格的车辆，亲自提货、搬运、押运。通过省红十字会，我为洪山街、卓刀泉街、梨园街筹集到1270箱蓝月亮洗手液、80箱漂白水，共计9.1吨。

当得知洪山区房管局有消毒药水滞留在东西湖区工业园区和蔡甸区大集镇救灾仓库时，我主动请缨，联系车辆，于2月1日、2日将全部物品送到指定地点，从组织、搬运、押运到分发，全程参与。我还将武汉

东湖高新区房管局滞留的消毒药水运输到指定地点。人手不够，我就自己当搬运工装卸货物，共计运送防控物资 11.7 吨。

1 月 29 日开始，为了进一步阻断疫情传播渠道，武汉开始大规模征用酒店用于隔离疑似人员。2 月 3 日，梨园街道紧急联系我，说辖区内的一家连锁酒店被紧急征用为新冠病毒肺炎隔离点，急需 2~3 位保洁人员。当时正值春节，大多数员工都已回乡，留在城内的寥寥无几，且受封城的影响交通不便。我义无反顾地顶上了，带领 2 名保安队员准时赶到酒店报到，从高管变身临时保洁员。

后来由于患者增长，隔离人员被转移到另外一家面积大一倍的酒店，但是服务的保洁人员还是只有我们 3 个。整整 40 天，我每天早早从汉阳四新家中出发，驱车 30 余公里接上另外的同事，再一起到酒店开展工作。结束工作后，再把他们送回住地，每天都要在市内驾车两个半小时。

那段日子，我们 3 个人都是义务工作，负责了整个隔离酒店疫区房间、医务人员房间、过道、楼道、餐厅及接待大厅的全部保洁卫生，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就连连体的防护服脚底都被磨破了，物资珍贵，我只能因陋就简踩起“企鹅步”坚持工作。

我当过兵，上过战场，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但是新冠病

毒对人的死亡威胁跟之前的那些完全不同。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被救护车拉到隔离酒店，仿佛空气中都充满了病毒，更何况我们需要服务的是吃喝拉撒都在一个个封闭房间的隔离患者。作为易感人群，我又何尝不害怕呢？但是部队的生活经历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而作为政协委员，我更是责无旁贷，必须站出来起表率作用。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到 3 月 16 日结束隔离酒店的保洁任务。

2 月 13 日，是我的生日，但 2020 年的这个生日注定特别。当天一大早，我拎着一个装有口罩、手套、防护服、工作服、护目镜、酒精喷壶、手机充电器、水杯和糖尿病药物的提包出门，当天是我到 027 社区搭建“消毒通道”的日子。临出发前，老伴将早餐递到我手上，与往日不同，那天的早餐是老伴精心制作的手工面，碗里还多出了两个鸡蛋。

老伴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吃了再走吧。”可时间不等人，看着电视里医护人



2019 年 5 月，在锦绣方圆物业公司管理的黎明新居小区，曾学斌委员（右）正在检查员工食堂的食品卫生

员舍生忘死地抢救生命，我又怎么坐得住？早一天把消毒通道搭起来，居民的健康安全就早一天得到保障。这碗长寿面的份量非常多，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早餐吃得太多会造成血糖控制失衡，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但没办法，疫情期间，没有餐饮店开门营业，中午的一顿肯定是没有着落的，晚餐能不能准时吃上也是个未知数，为了保证足够的体力，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上午10点，4岁的外孙发来语音：“祝爷爷生日快乐！”“爷爷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我和妈妈、爸爸已经为您做好了生日蛋糕，我要为你切蛋糕。”

家人的理解和鼓励是我的坚强后盾，这个生日，虽然不能在家安享天伦，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将铭记于心。

生日的第二天就是西方的情人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汉，没有商家的氛围造势，我和同事、业主们用彼此的温暖和陪伴度过了一个真正有情的“情人节”。当天清晨，天幕朦胧，武汉市白沙洲大市场迎来了一支特殊的买菜车队，在印有“情系孤寡老人，锦绣物业送菜上门”等字样的面包车旁，我和公司高管组成的运菜团队将新鲜的大白菜、红菜苔、土豆、红萝卜进行分拣和装袋，1000份共4吨的新鲜蔬菜是锦绣公司首批定向爱心捐赠给在管项目中10个小区的孤寡老人及困难群众的生活物资。

陆续收到菜品的业主在群里说：“今年的这个情人节，我们都是彼此的亲人。”“昨晚还担心出门买菜的问题，今早你们就送菜上门，真是‘及时雨’，太感谢你们了！”这样的致谢在各个业主群和项目服务中心不时传递着。物业尽责、业主暖心，还是2月14日，锦绣公司在管的玉桥新都小区132位业主为了感谢物业在特殊时期的

无私付出，自发募捐了近1.2万元给物业人员“发奖金”。疫情期间，锦绣公司托管的所有小区全部被荐参评为“群众满意小区”。

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全面向好，武汉进入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复工复产的新的战斗中。

从农村到城市，从当兵到转业，从普通员工到劳动模范，从民革党员到政协委员，这一路走来，我始终秉持着一颗初心：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接下来的路，我将以信念坚守初心，用奋斗诠释使命，继续坚定前行。

（曾学斌：八、九届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委员，九届洪山区政协副秘书长，武汉锦绣方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品质管理部经理）

我和导师陶德麟先生的师生情

◇ 倪素香

惊悉导师陶德麟先生 2020 年 5 月 24 日下午 5 点 08 分溘然仙逝，学生不敢相信，悲痛不已。5 月 28 日与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心情始终无法平静。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时在脑海浮现，一切都仿佛在昨天。谨以此文记下先生的指导与教诲，表达学生无尽的怀念与哀思！

幸入陶门，师生结缘

我初识陶德麟先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从东北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懵懵懂懂地踏入哲学园地，就听闻陶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陶德麟先生大学毕业后就留校担任时任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在我入学的那一年被国务院评为博士生导师，对我们来说唯有崇敬和崇拜。那时，我从未想过也不敢想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学生，谁曾想十年后

我竟能忝列门墙，有幸与先生结下不解的师生缘。

我 1984 年入学，1988 年获得学士学位。而 1984 年至 1988 年，正是陶先生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时期。因行政事务繁多，陶先生并没有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只是做过几场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毕业那年陶先生作为系主任专门给我们毕业生作的毕业演讲。6 月初的武汉，天气开始微热起来，我们坐在下面静静地聆听，还没有那么强的热感，但在作报告的陶先生却因为站着讲话而汗流满面，不时地用手绢擦汗。当时负责组织活动的辅导员看此情景，询问陶先生是否开启电扇？陶先生说，电扇的噪音太大，影响效果，同学们不觉得热的话就不要开了。就这样在闷热的条件下，陶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勉励我们继续前行，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不要辜负母校的培养。那天陶先生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我都记忆模糊了，但陶先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形象却从此在我心中树立起来。他不仅儒雅、博学，更有爱心、关怀，先生不再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是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后，我萌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此时陶先生已是武汉大学校长，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讲师，自然是不敢报考陶先生的博士的，所以我最初想报考的是另外一位导师。当我把报考博士的想法向系里汇报后，系里建议我报考陶先生的博士，因为研究方向更切合我的研究基础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于是我在报名表上导师一栏中谨慎地填上了陶德麟先生的大名。填完报考申请后，我想还是要跟陶先生联系一下，请教一些问题。考虑到陶先生工作忙碌，我选择在休息日或晚上联系他，但打了两次电话都是师母接的，陶先生忙于公务都没有在家，只能向师母告知我的想法。第三次我再冒昧致电时，师母说陶校长已经知道我报考的事情，他现在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接待我，让我跟欧阳康老师联系报考博士具体事宜。还是因为忙，博士生复试陶先生也没能参加。就这样一直到收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也没能与陶先生见上一面。

1994年，我终于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弟子。不幸的是博士生入学体检时，我被查出患了气胸而住院。幸运的是因为住院，我见到了陶先生，有了跟导师的第一次私下交流。当时陶先生因探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副校长，来到武大校医院住院部，正好是我住院的地方。我听到医生说校长来了，连忙起身走到走廊，看到校长一行走来，我马上走上前，对陶先生说：“陶校长好！我叫倪素香，是您今年招收的博士生。”先生问：“你怎么在医院？”我说我体检查出患了气胸，现在住院治疗，不能上课，非常不好意思。先生说：“你安心治疗，课程以后再补。”听了先生的一番话，我稍感欣慰，于是在医院安心养病，经手术治疗康复后在第二学期开始上课、补课，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

我攻博期间，先生还是承担着重要的行政和科研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给予



1998年5月26日，倪素香（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与导师陶德麟先生合影

我学业的指点和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从选题、提纲到初稿、定稿，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先生在我论文初稿上留下的批语和建议，给了我莫大的启发，我也得以顺利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我与陶先生结下了师生情谊。

倾心教诲，师生情浓

陶德麟先生不仅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影响着他的学生，更是以他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不管行政事务多么繁忙，先生一直站在学术工作的最前沿，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早已是桃李满天下。我以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而倍感光荣，更荣幸的是先生不仅在我们就读期间教授我们的学业，更是在我们的事业发展中不断给予鼓励和帮助。

我博士毕业后，先生仍不断给予我学术上的关心和事业上的引导。我2001年博士论文出版时，忐忑地向先生提出，能不能给予扶持，拨冗为拙著作序，先生欣然应许。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巨大工程中增添了坚实的砖石，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作者的初衷所在，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这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也成为我学术研究道路上最大的动力。我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伦理研究》申报过程中，也得到先生的指点和支持，先生亲自修改我的申报书，让我感动不已。2008年，在项目完成出版之际，又得先生大力扶持，再次为该成果的出版作序。他在序言中再次勉励我：“从博士论文《善恶论》的纯理论研究转换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作者来说也是一次跨越式的进步。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但我以为《制度伦理研究》一书为制度伦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相信出版后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也希望作者把此书的完成当作新的开端，虚心听取专家学者和其他广大读者的批评，继续作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作者的导师，我也愿借此机会对多年来帮助和扶持倪素香同志成长和进步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先生的肯定和抬爱，我十分感激！

为了提携后学和弟子，陶先生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子课题的研究，继续给我提供求教和学习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课题团队，在陶先生的指引下继续探索和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这一课题，研究成果201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再次为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作序，他说：“作者并不回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各个历史阶段争论的焦点问题，客观公正地分析其背景和特点，是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中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本书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本书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史的简单描述，而是探讨了每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及其如何在问题的争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因此，本书也呈现出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研究的深度，具有问题意识和历史视角，是问题史与发展史的统一。”这又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鞭策。

先生卸任校长一职后，开始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

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多部著作，笔耕不辍。陶先生还把他出版的《陶德麟文集》签名送给我，让我开心不已。

先生也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并不断在会议上发表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让与会专家和学者深受教益。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因此有机会我就尽量参加有先生出席的学术活动，继续领略大家的风采，继续接受先生的引领，和先生的学术情缘也越来越深。

我今天能有幸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者和博士生导师，与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我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先生仍以他的高尚人格影响着我，引导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先生不仅教会了我专业知识，更为我树立了做事和做人的典范。

殷切关怀，师恩永存

先生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和接触。陶先生对学生的点拨和提醒如春风化雨，他从不严厉批评学生，都是在轻声细语中透着严谨和温暖，在润物细无声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博士毕业后，基本上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我都会拜访先生，如果碰巧家中来客不多，先生就会和我聊起家事，聊起他成长的过程。从交谈中我知道了陶德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末儒士，在家乡开办学馆，一生清贫。他的父亲幼承家学，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在家中藏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并护送其出境被国

民党当局免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父亲贫病交加，仍拒绝为国民党当局服务，于1949年病逝。陶德麟先生的母亲曾就学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中小学教师。陶先生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西学素养，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当年他父亲不顾生命危险保护共产党人，由衷地让人敬佩。我好奇地问：“您的父亲怎么会那么勇敢？”先生说，父亲当时并没有询问到自己家里躲避的人的身份，但心中已猜到他们可能是共产党，父亲觉得不管是什么人被国民党杀害都是天理不容的，应该想办法保护他们。父亲对国民党的很多做法也多有不满，以致在1948年愤而退出国民党并拒领退休金。我想，1978年先生冒着风险投入到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勇于担当，一定是



2014年，倪素香（左）与陶德麟先生在武汉市新洲区参加学术研讨会后合影

有其父亲的影子的。先生百折不挠、人道情怀、虚怀若谷的高贵品格想来也是深受家学的陶冶，让后辈敬仰。

先生也曾和我谈起他求学的经历，我想也是在敦促我勤勉奋进吧。先生没有上过小学，抗战时期举家迁至恩施，学习环境异

常艰苦。即使是这样，先生在12岁时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立实验中学。先生说尽管那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大家在油灯下读书，在河水里洗脸，在操场上进餐，但还是锻炼了坚强意志，培养了浓厚的报效国家的情怀。先生还补充说，因为是省立中学，他们的学费是免费的，食宿也是免费的，抗战胜利后他随实验中学迁回武汉继续学习，也是免费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一些中学还可以实行免费教育。先生说，这是因为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背井离乡，大多无依无靠，所以政府决定这类中学全部免除学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先生特别感恩这一段的生活，尽管有许多困难和艰辛，但有国家的支援和大家的努力，也让生活充满了希望，奋斗有了期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大学同时录取，最后因为要照顾母亲选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听先生讲述他的求学经历，我心中不免感慨万千，先生在那么恶劣



2010年，陶德麟先生（前排左四）八十诞辰宴请汉弟子，前排左五为倪素香

的条件下都能坚持不懈地求学求知，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先生并没有直接告诫我要不畏艰险、要永不懈怠，但他的人生经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是他书写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先生还和我谈起过他在“文革”中的过往，可谓刻骨铭心。当年年仅35岁的先生成了全校的“黑帮分子”之一，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其间又一度被加上所谓“5.16分子”的罪名，关在单间牢房里被刑讯逼供，并以“假枪毙”相威胁。其中有昔日的同事为表“忠心”，对先生拳打脚踢，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对先生揭发批判，先生虽然伤心但并未记恨。他和我说起其中一个伤害过他的老师，后来因为住房的事情求过他，他并未打击报复，而是吩咐相关部门按照规定予以解决。我问先生为什么不恨哪些打击他的人，先生说，“文革”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错不能让人来背负，我个人不需要他们道歉！这是何等的胸怀啊！就是后来他担任领导职务，

面对持不同意见甚至批评他的人，先生也总是一笑了之。甚至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先生总是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爱护和帮助。宽容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对对手的宽恕更是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先生的博大胸襟和虚怀若谷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足以让对手折服，让学生仰慕，让世人敬佩。

先生不仅给学生弟子亲人般的关怀，他对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关怀有加的。先生生病期间我多次探望，没有想到先生不是在关心自己的身体，而是总在问我的身体如何，让我十分感激。因为住院与先生最初的邂逅，成了先生一直不忘的关怀，几乎每次聊天，先生都会嘱咐我注意身体。先生不仅关心我，还时时询问我家人的情况，对我女儿能出国留学后又回国读博士，先生由衷地高兴。即使女儿不在国内，我去探望先生和师母，临走时师母也会拿出一盒糖果让我带回来，让我跟家人分享。先生一家对待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同仁都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收到过先生春风般的嘱托和师母送的巧克力。但是先生却从来不接受学生们的吃请，每年教师节我们弟子都想请老师出来聚一下，先生总是以身体不适为由予以拒绝。但是在他八十寿诞之际，却要请学生们聚餐，我们自是不肯，但导师发话，如果不让他请，他就不出席。没有办法，弟子们只好依了先生。先生高洁清廉、正直仁厚的品格可见一斑。先生真的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从不因为自己的学术地位和行政地位怠慢任何一个人，傲慢、自负、盛气凌人这些字眼都与先生无缘。对待同事、下级、学生，甚至不相识的人，先生永远都是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平等相待。每一个向他求教的人，都会得到先生耐心的对待和细致的解答。

2020年1月20日，我应邀在省人民医院采访先生，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记忆清晰。当我说到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时，先生马上说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今年是200周年诞辰，列宁是生于1870年4月22日，今年是150周年诞辰。听到先生对几个诞辰日期不假思考就脱口而出，而且准确无误，我想他的身体应无大碍，很快就会治愈出院，谁曾想这一次和先生的见面竟是永诀。采访的稿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陶德麟教授》于5月刊发时，正准备拿去给先生过目，不想噩耗传来，这篇采访竟成了先生最后的语言和文字，也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纪念和缅怀。

先生用一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并教给我们学术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先生用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于我而言，先生不仅是一位恩师，也是长辈，是如父亲一般的亲人。先生谆谆的教导、时时的关心、暖暖的问候，点点滴滴我都记在心里、存在脑海。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教诲和关怀会让我终生受益，也将永存心间！

（倪素香：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 提案背后的故事

◇ 肖国金（口述） 徐静芝（整理）

2020年1月初，民建武汉市宣传部致电告诉了我一个消息：“2019年11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对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进行了表彰，由您执笔的《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从14余万件提案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啦！”

获悉这个消息，我可谓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想到二十多年前撰写的提案竟能获此殊荣；喜的是，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参政议政工作的肯定。

1月中旬，民建武汉市宣传部一行专程来到我家中探望，我在同他们的交流中，回顾了这份提案背后的故事。

（一）

我曾任武汉大学工商管理系第一任系主任、教授，湖北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

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提出了不少发展战略建议，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并被采纳。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出之前，我也提交过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提案，比如“圆心理论”，比如“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

在199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同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圆心理论——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的提案。这件提案后来分别收到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答复，均予以高度评价。

在1993年6月召开的全国关贸总协定高级研讨会上，我作了“圆心理论——将武汉建设成国际大市场”的发言，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并获得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授予的“最高决策咨询奖”一等奖。

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实行国有企业再造工程，进行

第二次创业》的提案，大会秘书处立即将其列为大会发言材料予以印发。提案提出了“衰变、裂变、聚变”论，还提出了关于“国有经济新定位理论”（简称“抓大放小”）和“混合所有制”的建议。

现在回看，这个提案的很多重要论点与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相关内容不谋而合。

这是巧合吗？不。我为了做好“国企改革”这篇文章，从1988年撰写“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起，到1995年“国有亏损企业的出路”止，花了7年时间。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我用工资加上微薄的稿费买资料，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写出了这篇提案。当时党中央发动全国各界人士研究、探索国企改革和发展之路，最终才有了《决定》这一集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之大成的文件，能在国企改革与发展问题领域探索并有所贡献，我也深感荣幸。

提案工作绝非一日之功。这一步步积累，磨砺了我钻研的意志和精神，丰富了我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我对参政议政课题的把握能力，为我执笔《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

民建武汉市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本次全国政协的评选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选题准确，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反映情况真实，分析问题深刻，建议明确具体；三是成效较为显著，对宏观决策、长远规划和改进部门工作等有重要参考价值，产生了重要

影响。全国政协从70年间累计的提案中，围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选出了为推动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提案，其中就包括由我执笔的《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

听完他们的介绍，我深感自己的提案能入选实属不易，思绪也逐渐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积极关注再就业工程，开始进行调查

研究。我向来笃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撰写这个稿子，我先后在武汉、上海、江西等多地进行调查，都不记得调查了多少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再经过认真思考，反复研究，才得出结论。这篇提案的原稿是我事先在家里准备好的，先写了小卡片，再扩充形成稿子，后来带着稿子来到1996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又用大会发言稿和提案稿的稿纸一一进行誊正。

当时在北京，我把提案稿交给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胡照洲同志，请他帮我看看，提提意见。后来通过深入交流，我请胡照洲同志牵头作为第一提案人，联合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民建副主委金斌统同志等多人，将此作为联名提案提出。由于时间紧张，其余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又住在不同的宾馆里，最终，由胡照洲同志通过电话与另外几位同志进行了充分的联络与沟通，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们分别在当时的提案首页代签了他们的名字，由7人联名提出《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

《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案提出后，当年12月获评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优秀提案。胡照洲同志还专门拍了当时所获荣誉证书的复印件的照片，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特别写明——“此件系肖国金教授之佳作”，“提案人：胡照洲、肖国金、金斌统……，执笔人：肖国金”。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知识产权的尊重。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从八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推动实施再就业工程、解决企业下岗职工安置再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案中第一次提出了“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何为“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是指三产业在一、二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三产业发展到一定极点，又与一、二产业融合，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兴产业，每隔一定时期，又上一个新台阶，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提供充分就业机会。

在那个年代能够提出“双螺旋”台阶式就业法，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现在新闻里经常提到，第三产业已成吸纳就业最大产业，而且鼓励职业培训，提升素质，都与我在提案中所写不谋而合。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但其内容跟现在报纸上、电视新闻里谈及就业时的很多提法是一致的，这也应是我写的提案能入选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重要提案的原因之一。

（三）

民建武汉市委宣传部的同志问我：“有没有参政议政方面的心得可以分享？”我特意请他们走进我的书房看看，这里堆满了大量书籍和报刊，靠墙摆放的几排大书柜装得满满当当，上层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下层的柜子里存放着多年来我亲身调研的资料、亲笔撰写的原稿。这些资料和原稿全部用牛皮纸文件袋包装好，分门别类堆放得整整齐齐。我让他们抽出其中一份，纸袋上面清楚写明里面的资料是关于什么研究内容的。这些文件袋装满了书柜内外两层，抽出来的只是外面一层中的一份而已，柜子里面还有一层。这一摞摞资料，都是我下大功夫悉心研究的证明。

另外，我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字——“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来；读书求理，读史明智；集思广益，兼听则聪；



2020年1月，肖国金先生（左）在家中回忆《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提案背后的故事

冷静思考，要有主见；沉思出智慧，实践出真知。”这是2007年我亲笔书赠家中孙辈的。我也借这幅字的内容，说说自己从事参政议政工作的做法：

一要深入调查，所谓“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二要认真读书，反复研究，要把信息吃透；三要集思广益，兼听则聪，同时要有主见，要有自己的看法；四是实践出真知，研究一定要靠自己亲自做。

我一直坚持着这四点做法。退休后，我依然用微薄的退休金买资料，继续围绕参政议政搞科研。我写了《把信用转化为财富——亟待制订和颁布〈信用法〉，创建信用工程》，报送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并得到批示：“此文很好，可登在适当的刊物，以使市、县干部了解必要的知识。”

《把信用转化为财富》一文被刊载在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政策》（2002年3月号）。

如今，我虽已92岁高龄，依旧天天坚持读书看报看新闻，从中获取信息，从不间断。我在家订阅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每天都看电视，特别是《新闻联播》看得非常认真。我一直有记小卡片的习惯，一旦看到重要的信息马上用卡片记下来，这样才能知晓民情。这些年来一张张写满字的卡片，都不记得写了几千几万张了。

曾有人问过我，何以如此钟情于议政调研？我的回答是，谁叫我们赶上了好光景呢。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中央出题，地方调研，反复多次，再行决策，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民主，决策的民主。生活在这种真正的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我们不趁着还能动能想，为人民多做点事，那可真是于心有愧呀！

全国政协为表彰此次入选的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专门制作了铜牌，《关于实

施再就业工程八大对策》由7人联名提出，但铜牌却只有1个。为此，武汉市政协专门找到制作铜牌的厂家，照原样进行复制，分别发放给我们7位委员。感谢宣传部的同志把属于我的这块铜牌专程送到我手中，这也是属于民建的荣誉，我希望把这份荣誉交给市民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级政协、统战部和民建组织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我围绕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做了一点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民建的培养。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我希望把这个铜牌作为感谢民建培养的回报，放到市民建机关。还有我家里留存的提案原稿，我希望用玻璃框装裱起来，写明是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之一，和铜牌一起陈列在市民建机关里。

（肖国金：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建武汉市第九届委员会主委、第十届委员会名誉主委；徐静芝：民建武汉市宣传部干部）

问津河畔的教育世家

◇ 谢文先

(一)

在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齐安大道凤凰里94号有一户特殊的大家庭，全家20人，四世同堂，三代从教，先后走出了“2博8硕”，有11人工作在教育岗位，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7人，共产党员9名。2005年以来，该家庭先后被湖北省妇联和武汉市文明办、市妇联授予“学习型家庭”和“特色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2020年已93岁的蔡振华是这个特殊大家庭的首任“家长”。他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读小学时被师生们誉为“百分大王”“语文大家”，读中学时受到县长特别嘉奖，荣获七块大洋。20世纪50年代中期，蔡振华被借调到湖北省教育厅参与编著《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名词浅释》，1956年该书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蔡振华回县后，担任县教研室主任，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教育新星。

1957年，在蔡振华人生的黄金时期，一场无情的暴风骤雨把他的前程撕得七零八落。他被错划为“右派”，贬黜归田。本该用笔尖书写优美文字的手，干起了犁田打耙、锄禾播种的农活。而在新洲区邾城三中当老师的妻子左志学，认定了丈夫的人品和才华，坚持以离散子女的方式为孩子们顺利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与丈夫不离不弃，共同撑起了这个家。

两位老人无论是在艰难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常为家人描绘“追求知识，铺平复兴路”的宏图，引导大家庭发奋读书、追求知识。他们用科学的教书育人理念哺育三代子孙健康成长，并省吃俭用设立“华(蔡

振华)学(左志学)大家庭教育基金”,倡导学习型家庭建设。他们坚持对孩子的学习开展评先奖优:凡考取硕士奖励3万元,考取博士奖励4万元,营造了“终身学习、永不停息”的良好氛围。

在二老的言传身教中,终生学习、不懈奋斗的家训得以代代相传。20世纪90年代,随着儿孙们学位的不断攀高和职位的逐渐升迁,蔡振华与左志学二老在深感欣慰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家庭成员的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他们用“重精神、轻物质,重学位、轻职位”的家训,划定了大家庭的“生命线”。二老在全家三代人参加的家庭会议上,立下遗嘱:“希望子孙们继承这样一份遗产——切实坚持三个‘变中不变’,即个人的地位变了,高尚的节操不能变;社会风气变了,清白的家风不能变;家庭经济



1956年,青年时期的蔡振华(左)和左志学

条件变了,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子原则不能变。”在优良的家训精神指引下,家庭成员加强学习,防腐化、抗风浪、添福祉、利家国。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1978年,也就是蔡振华平反复出任高中教师的第二年,“华学大家庭”一一召回了离散在外的子女,并举行第一次家庭会,讨论子女们各自的发展方向及家庭复兴大计。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最后决定:次子脱产复习,准备迎接高考,长子和三子先工作,边工作边学习,都必须按时完成学习任务。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长子蔡旭红,受父亲牵连最多,但他始终难忘教书育人的初心。虽然后来在高校做行政管理工作,但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纪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休多年后,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仍然在湖北省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会任职,继续着自己的教育初心。提到父亲蔡振华和母亲左志学时,蔡旭红一脸的佩服:

“1977年春天,父亲终于平反昭雪,得以重返工作岗位。他像一个充满动力的马达,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为了备好一堂课,他古今贯通、中外关联;为了改好一篇作文,他常常通宵达旦。青年时代的父亲做教师从不守旧,引入最前沿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做校长时,他狠抓教师备课,创造性地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将教学管理推向一个新阶段。即使是退休后的10年,父亲仍然工作在教育第一线,把浓浓的爱心融入课堂。

89岁的母亲左志学退休前一直耕耘在教学一线,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教育发展的变迁。在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中，母亲带班数次创下全班学生整体升学的奇迹，虽然受家庭成分影响，晋升评优几乎与她无缘，但她从未抱怨。母亲也曾坦露自己的心声，她可以忍受不公平的境遇，却不愿看到一名学生掉队。在她心中，学生的成人成才，远远胜过自己的得失。”



2016年春节，“华学大家庭”合影。二排左二为蔡红生、左三为左志学、左四为蔡振华、左五为蔡旭红

次子蔡红生，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在父母的支持下毅然选择了继续读书，于1979年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华中师范学院生科院学习。

提到高考，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1979年高考倒计时60天的时候，公社的知青干部送来一个地质队招工指标，给蔡振华次子办理招工手续，并说这是特优的招工指标，全公社只有两个，另一个知青干部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二老和蔡红生协商后，断然谢绝，放弃了这次招工机会，继续读书。对于这一决定，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蔡振华所在高中的领导和教师也都为之哗然，并善意地指责他们是“大学迷子”。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蔡红生以优异的成绩圆了大学梦。

“赶上好时代”的蔡红生先后获得华中师范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学士学位。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并先后10次被借调到教育部思政司、社政司和人事司工作；1995年至1996年受教育部

派遣，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进修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回国后又在母校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先后取得此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承担了10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的研究，出版了《中美大学校园文化比较研究》等学术著作，主编和参编书籍10多部，多篇研究报告被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厅采用。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读师范院校并不那么紧俏，“臭老九”的阴霾还没有完全散尽，教师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尊重。蔡红生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竟是父母的一致意见，如果不是他们深厚的教育情怀，这是很难做到的。正是在这种教育情怀的影响下，蔡红生也把教育作为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学校领导，无论是在华中师大执教还是到新疆师大援疆，都怀揣一颗为教育献身之心。

在父亲的影响下，蔡红生兄妹大多都做了人民教师。他的妻子也是高校教师；他

的大哥和大嫂退休前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教师；弟媳在教育战线工作；他的妹妹和妹夫是中学教师，现在工作在教育行政岗位上；他大哥的儿子和儿媳也是高校副教授。

作为“华学大家庭”中的第三代教师，蔡旭红的儿子蔡勤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后与妻子以优异成绩通过公开招考进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如今，已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的蔡勤多次获得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19 年，同为副教授的妻子还获得了学院授予的“教书育人十佳标兵”光荣称号。

（三）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满园春。”

蔡振华二老对教书育人的热爱，从爱自己的孩子开始，扩展到一届又一届、一位又一位学生身上，即使不是自己的学生，只要听说哪个学生求学路上遇到困难，都会牵动他们的心。二老无私资助过无数困难学生，从 40 年前的几张白纸到 30 年前的一口饭菜，从 20 年前的一套资料到 10 年前的一期学费，从 5 年前的成百上千元到现在的短期和长期资助，家人已经记不清二老与多少学生有过交集。

遇到有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或借读无门、面临辍学时，二老只要听说，都会无条件地为其四处奔走，找关系说人情，请求少交或免交学费办理入学手续。这样的情况每年都有，不少孩子都得以顺利走进了学堂。

遇到高考考分上了线却因填报志愿不当而落榜的学生，二老也是想尽办法帮助他

们圆了大学梦。2005 年，经过二老多方联系协调，武汉理工大学和咸宁师生分别补录上线生两人。

遇到经济贫困的大学生时，二老采用一次性资助和长期资助两种方式送去温暖。如原新洲区和平乡的马姓同学在湖南大学就读，因拖欠学费学校不发毕业证，不准考研，二老一次性资助 2000 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为了光大“为国教子”理念，二老将多年的教子心得写成《教育父母》一书，免费送给周围已经成为父母的人。蔡振华说，一家强，不算强，万家兴，国家才会兴。

正是怀揣着“教育兴国”的梦想，这个家庭三代园丁坚守讲台，谆谆教诲，为他人筑梦，把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教育精神深深融入到每个成员的心中；把和谐家庭建设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教书育人”“为国教子”成为这个家庭三代人坚守的那份执着，“播撒希望”成为这个家庭三代人的不懈追求。

（谢文先：武汉市政协机关干部）

新洲清代举水书院杂记

◇ 王腊波

举水鉴人

举水书院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肖桥村，创建于清道光年间，为当地民间创办的讲学之所。因书院坐落在彼时的举水河滨，因此得名。

举水发源于大别山南麓风波潞山，自北向南，流经河南新县，湖北麻城、红安、新洲，由团风注入长江。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举水发大水，冲开新洲柳子港夹洲地段，形成东西两道支流，其中西支沿原主流河道南流，再分3条小支流，第二小支流流经肖桥街头东，又分一更小支流，形如杨叉，东、南、北三面的水环绕肖桥街，水绕街北倒流，折西南下，入涨渡湖分泄入江。举水书院，得北倒流水之灵，择地而建，正好建在杨叉河之中。

举河之水，清且涟漪，每年秋季，明澈可鉴人。科举制时，一些麻城、黄安、黄

陂的考生到黄州府应秋闱下场回家，途经举水，常用瓦缸带举河之水回家烧茶，据说喝了举水茶，聪明，中试有希望。这只是一种有趣的传说，事实当然不至如此，不过它说明举水实在是好。

书院兴衰

清代，举水书院所在的行政管理辖区是湖北省黄冈县慕义乡城南村，此辖区名称一直沿习至民国七年（1918年）。清代黄冈县划为9个乡，新洲城周围属慕义乡，城的周围以方位定村名，而肖桥街地处新洲城南，故名慕义乡城南村。因清代、民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里为乡间小集市，民间俗称“肖桥街”，随着时光的流逝，今演变为普通的村湾。

清道光年间，举水书院初建，是以慕义乡附近的殷实人家汪登山为首的读书人合股集资首建。至同治七年（1868年）农

历八月二十七日，汪登山的孙子汪鸿翥重修，由20余人合股集资建成。主要合股集资人是：吴耀文、靖南全、靖明意、罗化斋、罗常斋、吴祥宏、刘德甫、程子恒、程晓峦、汪幼丹、汪耀绪、刘志刚、靖伯英、汪安庭、刘典武、刘维善、罗南庭、姚晓香、邱欲山、靖恒甫、靖寿山、程文叔。

这些人多半是汪登山同代读书人的后辈，其中有些人是因家庭变故而没有读书，又因家境渐贫，故将该院的股份作价卖给没有股份的读书人（或者有股份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出钱就有份，没有出钱的读书人，只有参加“祭孔”权，没有所有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举水书院随从新政改为小学堂，书院之名废。

院舍建筑

举水书院坐东朝西，院舍建筑前后两栋，前栋与门左（北）的汪保金、门右（南）的吴利合屋舍比邻排齐，前栋大门面向正街，后栋檐抵肖桥河岸。书院建成以后，门额“举水书院”四个大字是当时的读书人且书法造诣颇高者刘德甫亲笔题写。

书院前栋为大殿，结实而宽大，栋柱粗壮，如乡间稻场石碾似的，虽不见雕梁画栋，可也是冠首一街。大殿正中供奉有孔夫子木雕刻像，神龛上挂有醒目巨额横匾，上书“文昌万世”，两边金字楹联抱柱，对联：

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究是先贤一大教

与天地日月星辰同其寿，不无后学纪斯文

大厅两侧，是两个大型的宣传窗。整个大厅的布局，给人以庄重肃穆的感觉，一

眼望去，阳光充足，空气对流，显得整齐深远，煞是壮观。

书院后栋为老师教学和学子读书之教室。

书院祭孔

书院前栋左右两边的门庭，每年租人经商，所得的租金奖励助教及祭圣之用。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时祭孔，祭孔活动隆重而严肃。参加祭孔人员由书院“文昌会”成员和当地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约20余人，整个祭孔仪式大致有上香、奏乐、行礼、献表、读祭、唱诵等。祭孔时，庭燎熊熊燃烧、香烟缭绕、钟鼓齐鸣、号角齐奏。释奠礼人员各司其职，其中大赞专司发号施令，亚赞主要协助大赞，廷赞主要是传达大赞的号令，祝官出读祝辞，队列的首行、二行、三行、四行则是大赞号令的执行者，主祭则专主跪拜礼，司仪四人专上供品、烧纸，歌童四人，唱诵一些诸如“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的唐诗，还有奏乐数人，司各种乐器。由大赞分别发令，随着行礼伴奏，这些人除主祭着绣花红袍外，其他人均穿青边蓝色大袍，设礼所，扎礼亭，行“九献礼”两天，还有祭文，极尽尊孔之意。

董事会章

举水书院有个管理组织叫“文昌会”，简称“文会”，名称来历大概取孔子“文昌君”之意。书院“文昌会”有许多职责，相当于当今的董事会性质，其职责有：

1. 逐年聘师，不论是否为该会会员，只要有文化水平，能胜任教学就行。在院内设馆教读私塾，入学学生约有40余人，均

是附近农家的孩子，也不论是谁，经费均自理，院内只供给老师所用的桌椅等。

清末至民国先后任教的教师主要有：刘德甫，清末贡生，刘坎贵塆人；汪安庭，民国初至抗战前，汪沙畈塆人；靖南泉，抗战前，旗杆塆人；沈子予，抗战前，汪家港人。

此外，抗战胜利至解放前，王少卿、程子恒、程晓峦、程文叔先后在此任教，其中“三程”均是附近程远塆的人。

2. 每年孔子圣诞日举行祭孔活动。

3. 通知组织非会员的文人前来举祭。

4. 奖赏科举取得功名的学成弟子。

5. 逐年选举会员中的会务管理人，经管是罗化斋、吴三腐。

6. 组织有名学者前来讲学。

该院采取个别钻研、互相答问、集体解答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讲习儒家经典为主，书写诗词和文章，间亦论议时政，对当时学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该院文会会章主要内容是：

1. 凡参加文会的会员应遵守会章，行为正直，立志好学不倦，为考中功名而奋斗到底。

2. 凡会员或弟子考取功名时，按等级发给奖金银两费。

3. 会员有教育子弟遵守社规社章、勤奋学习的义务。

4. 宣传读书的重大意义。

5. 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管理举水书院的一切事务。

6. 会员有祭孔权和享受奖励权。

书院演变

清末至解放前，举水书院一直受到当地人们的保护，文物建筑完整无损。即使在

抗战中，举水书院也没有损坏，孔子像依然受人供奉，祭祀仍旧举行。解放初期，新洲县肖桥乡政府设立在书院内，并在此指导了土地改革。之后，乡里成立了乡剧团，在院内排演节目，结合当时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公演戏曲，深受群众欢迎，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

1952年，书院作为公房处理，肖桥乡政府负责人张自造将其交给了肖桥粮店，前栋做粮仓，放粮300余万斤。1965年，书院拆除，粮店迁移到了肖桥街南重建，所需建筑材料取自于书院。

（王腊波：武汉市新洲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调研员）

苏恒泰油纸伞的前世今生

◇ 苏 峰

“风云变幻疾，四时无常理。兴衰更迭多少事，何曾被代替。晴时有谁理，逢雨身不离。泥泞之地行路人，皆以它护体。”

这首《伞吟》的卜算子词牌，很形象地描述了伞在人们生活中的使用状态。或许是古人由荷叶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伞，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古黄帝的华盖。据考，当时是以织物羽毛兽皮材料为主，所以它最早的汉字写做“繖”。

油纸伞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一把油纸伞，浸透了古人的智慧。她是华夏文明带给世界人民的礼物，是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一大发明。五百年前油纸伞飘洋过海，为世人所知，如今世界上所有伞的构造以及力学原理都是在中国油纸伞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直至今日她依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

提到近代油纸伞，就不得不提名扬华中的大汉口苏恒泰油纸伞店。清末民初，苏恒泰已成为汉口十大名牌之一，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湖北地区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苏恒泰油纸伞荣获一等奖。“苏恒泰”是我家传承150多年的品牌，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汉老字号苏恒泰油纸伞的第五代传承人，“新”字辈的苏峰。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苏恒泰油纸伞的前世今生。

我的高祖父“文”字辈苏文受，是湖南长沙东乡石门坎人，祖奶奶是浙江余杭人，他们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时即来到汉口码头靠替人修伞讨生活。由于手艺好，顾客络绎不绝，在有了一点积

蓄以后便购进原料开始制售油纸伞。他们大胆创新，不受地域限制，将湖南伞的耐用结合浙江伞的美观再加湖北伞的抗风柔韧集于一身，其产品脱颖而出，受到大众欢迎。同治三年（1864年），苏文受在汉正街关帝庙魁斗巷口购置小板铺门面一间，创立苏恒泰油纸伞店，取此名喻意长久安康，既指产品结实耐用，又指能护佑顾客通达四方。由于采取薄利多销原则，常常供不应求。苏文受为节约成本，每次都是自己去码头卸货，因为不愿意多交钱给码头把总，由此引发其不满，挑唆码头搬运工人与苏文受械斗。苏文受之前有过湘军行伍经历，自然不甘屈服，在争斗中他徒手夺取了40条码头搬运工砸过来的扁担，一时无人再敢靠近。此后凡是苏文受的制伞原料到岸卸货，再无人敢刁难。由此坊间相传，“苏恒泰的老板，一个人打了一个码头！”

因为有战时旧伤在身，苏文受早逝，由我曾祖父苏云生继承伞店。苏云生，“云”字辈，字“吉云”。一年夏天，天旱雨少，雨伞积压，曾祖父便让师傅们在店门口反复上桐油招揽顾客，却无意间发现这样的伞面异常光滑结实，由此发明了油浸油纸伞工艺，时称“琢货”，产品大卖，声名远播。可是，生产油浸伞很受气候局限，一年只有两个月时间最适合生产该伞，因此“琢货”采用和“行货”及普通伞1:10的比例混合一起售卖，买到“琢货”者如同中奖般欢喜，这也成为了苏恒泰最成功的营销手段之一。



“苏恒泰”第五代传承人苏峰正在精心制作油纸伞

由于积劳成疾，曾祖父苏云生自感时日不多，在1916年将其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苏荫泉由老家长沙东乡石门坎接来武汉接班。苏荫泉，“啟”字辈，字“啟贤”，16岁来汉口以后由老祖母扶持教授伞店制售业务。我爷爷常说，“老祖母一生勤俭节约，时常训诫到：创业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浪淘沙。”

1918年老祖母去世。临终前，她在床前拉着我爷爷的手嘱咐道：“苏恒泰是你祖父与我费尽一生心血创造起来的，你要好好守住，守住了这个基业，子孙是不愁衣食的，比做官还要好，这三个字是摇钱树、聚宝盆，但你必须用心把伞的质量搞得更好，因为你祖父是做好伞起家的，这是忠于顾客、保持信誉的必需条件；其次待人接物要诚信，还要处处让人一步，这是保家立身的要点，你要牢牢谨记。”自此，我祖父苏荫泉18岁就独自挑起了苏恒泰伞店。作为优秀的民族工业企业家，却生活在近代中国最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在清末，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据时期，直至解放，

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为了提高效率，他采用了流水线分工合作生产的方式，还在湘潭建立了油纸伞生产基地，改良油纸伞，培养优秀技术人员的同时还照顾他们的生活，请老师教授工人文化课。经过多次改良，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在他的经营下，苏恒泰油纸伞先后多次获奖，品牌被收入 1933 年出版的《民国实业通志》，产品出口南洋、东欧创汇。他本人也被推举为汉口雨具行业理事会会长、湖南长沙同乡会名誉会长。当时苏恒泰的伞定价银元一块，别的伞就只能卖八角。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每次到汉口演出都会专门采买苏恒泰油纸伞。

我的父亲苏行康，“肇”字辈，是第四代传承人。他采用的是整张棉皮纸铺伞面的美术伞的工艺，可惜在他那个年代，油纸伞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父亲临终前也抱有遗憾。

如今，这个担子落在我们兄弟三人身上。大哥苏纯一直重症在身，仍坚持收集整理资料文档。二哥苏雷负责筹措资金与宣传，我则专心负责做好油纸伞。我们三兄弟，在母亲的支持下，陆陆续续投入近百万元资金，从不计较回报。我们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之所以还坚持在做伞，除了有对先祖创业不易的缅怀之情，也是报答母亲对我们的期望。我母亲名叫胡荣珍，每当我们遇到挫折，她就会跟我们讲起过去伞店的轶事，使我们觉得责无旁贷，有责任和义务将这把伞继承下去，也算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让她老人家欣慰的事。

（二）

“柔桡轻曼，妩媚纤弱。”撑开一把油纸伞，或许使人联想到的是江南少女的婉

约。可谁知她也曾历经水浸刀劈、刮骨火燎，但是依然矜持而立，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空，遮风挡雨，护佑君安。

制伞十几年来，我寻遍了还健在的苏家老伞匠，结合家族传承的技艺，将油纸伞制竹、扎架、调浆、裱伞、熬油五大制作工艺完整保存下来。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就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桐油是桐树果里面的籽实压榨出来的油脂，具有耐高温和耐腐蚀性。桐油熬制技艺最难掌握，火候掌握必须精准，全凭经验。熬制过程中加入的矿石有如道家炼丹材料，是桐油能够熬制成功的秘诀，其性至刚至阳，方能抵抗阴湿侵蚀。从新手到熟知，我学习油纸伞的制作就是从熬制桐油开始的。

一把油纸伞，从伐竹算起，需经过泡竹、刮青、削骨、穿伞、糊纸、涂油、晾晒等 70 余道工序方可制成。

“春季装伞，夏季上油，秋季砍竹，冬天泡竹。”从选竹到制作成伞，约需半年时间，传统制伞工序是跟着季节走，每个时令都不能错过。过去伞匠做油纸伞会根据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安排不同的工序。秋冬“号竹”后采伐肉厚质坚的老竹泡于水池，竹子需要在水中泡制月余，去掉竹胶和虫卵，保持湿度和韧性。到了春天，锯断的竹节经过刮青，才能制作伞骨，待装好伞骨以后接着糊伞面，俗称“穿伞衣”，浆糊在夏天会因为虫多且容易变质，所以会加入一味叫做“白芷”的中药。油纸伞能够遮风挡雨，这与涂油紧密相关。老师傅们常说“做伞工序 72 道半，搬进搬出不肖算”，夏天最适合的工艺就是上油，特别是工艺繁复的油浸“琢货”，它是五道油，要薄薄地涂上去，每一道都要风干，只有夏季两个月的时间内

完成的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当然，现代工艺原料不断改良以后，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油纸伞，但我仍然遵循传统工艺的时令流程。

除了工艺考究，苏恒泰油纸伞的用料也力求上乘。为了恢复原汁原味的苏恒泰油纸伞，我踏遍全国寻找合适的原料。因为我们传统的原料产地经过半个世纪停产，加上我们现在的需求量很小，所以没有合适的供应链。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到处找原料带回家一遍遍试制，总算落实了符合标准又稳定的原料

来源。如把原来湖南茶陵的竹子换成老家长沙县的竹子，常德的桐油则换成十堰山区的冷榨油。说到找桐油，我有次在利川山区找油时在山腰差点翻车落入悬崖。

过去，我家伞纸选用产自陕西隰县手工的皮纸。可是如今该县的皮纸也成为了非遗，并且现在生产的纸和伞面纸还是有区别的。我便找到江西上饶的棉皮纸代替，并且用婺源出的紫竹做伞杆。

此外，粘合竹纸之间的柿子水制作、串伞骨的头发绳两项技艺失传已久，我就改为现代原料，等适当时机再来恢复。我还将竹伞跳换成牛角材质，解决了容易磨损和虫蛀问题，也提升了伞的档次。

解决以上原料以后就是复制工具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伞匠的主要专用工具有砍竹刀、锯子、刨皮刀、削竹刀、蔑刀、刮刀、弓钻、圆锯床、量尺、棕刷等，每一样都是木匠和铁匠手工制作，如今已经没人还会制作这些老工具，家族



2015年，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来中国访问，在武汉万达汉秀剧场接受苏恒泰工作室赠送的作品“汉秀”油纸伞

传承的唯一一套工具日益磨损，加上一直没有足够的制伞场地，这都是我急于解决的难题。

苏恒泰油纸伞的制作技艺，既然在我手里复兴起来了，我就不会让它在我手里断掉。对别人来说撑起一把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做好一把油纸伞，是我对苏恒泰最重要的承诺，也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即使环境和条件再艰难，我还是认为做好一把真正原汁原味的油纸伞才是我们的初心，就算没有效益，也不忍再次放弃。

（三）

一把小小的油纸伞，一个生动含蓄的传统文化符号，一百多年前的苏恒泰现如今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苏恒泰油纸伞的制作工艺繁琐，如果简化工序当然可以实现量产盈利，但是其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也就失去了载体。

为传承油纸伞文化，我始终保持油纸伞传统的制作规制。伞身长短骨为64根，暗合太极八八六十四卦，伞身长短骨两根一组形成32个“人”字形支撑结构。收合之间，寓意聚集人气，“天人合一”，撑开又似“开枝散叶”，可以参见繁体字“伞”。伞身支撑的短骨中间以五色丝线“穿花”，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伞上面朝天为乾，伞下站人为坤，伞顶包布方巾与古人头顶的束发方巾一样的扎制方法，称为“四维方巾”，寓意礼、义、廉、耻四维。

民间婚丧也会用到这把伞，油纸伞谐音“有子孙”，因此过去江汉平原一带结婚时女方都会买一对，红、绿各一把的苏恒泰油纸伞作为嫁妆，寓意红男绿女。如遇丧事，报丧人在亲友家门口，将伞头朝下即可说明来意。

而今，我将油纸伞的实用性结合艺术性，在伞面采用国画兼工带写的技法，浓墨重彩，创立汉派伞面国画风格。

2006年，我们注册了“苏恒泰”商标。2011年，在硚口区汉江湾成立了苏恒泰商贸有限公司。同年9月，第一批100把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五色旗穿花油纸伞面世。2013年，苏恒泰被武汉市商务局认定为“武汉老字号”。2014年被武汉市旅游局指定为“武汉礼物”，时任市长唐良智赴法国访问，携带苏恒泰油纸伞展览一周。2015年，我们的作品“汉秀”，作为礼物赠送给到访中国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德夫妇。2017年，苏恒泰油纸伞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本人也被认定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年，苏恒泰油纸伞作品“飞天”“中国红”被湖北省档案馆永久收藏。

2018年，我被省文化厅推荐给文化部，



2018年，苏峰（中）和大哥苏纯（右）以及油纸伞爱好者在汉口里合影

作为中国非遗代表之一赴尼日利亚进行文化交流。2019年，我开始和硚口区、江汉区的小学互动，推广油纸伞的制作技艺和传播油纸伞文化，同时也在省二师、华师、华科、武大、湖大等大学举办展览和讲座，我已计划今后在这类公益活动中投入更多的时间。

“百年沐风雨，只手擎乾坤。”我心中常常默念这幅挂在2015年修建的硚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苏恒泰伞店的门联。它不仅是对苏恒泰伞店的寄予，更是苏恒泰代代传人的真实写照和五代制伞人的精神总结，延续记忆，守住精神，传承技艺，传播文化，愿我的夙愿终将实现！

（苏峰：硚口区政协常委，武汉市民间工艺大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